初　期　儒　家*

陳　榮　捷

一、孔子的弟子——第二代
二、大學
三、弟子的弟子——第三代
四、中庸
五、五行問題
六、弟子再傳弟子——第四代
七、儒墨的關係
八、荀韓的批評
九、結論

初期的儒家，是指春秋末期的儒家，即是孔子的第二三四代，剛在孟子之前，大概從紀元前五百年到三百五十年之間。關於這條題目，材料不多，答案更少。我們先看孔子弟子的姓名、人數、年歲、國籍、社會背景活動和思想。

一、孔子的弟子——第二代

1. 弟子人名表　關於孔門弟子的記載，最重要的是太史公司馬遷（145–86 B. C.）的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和孔子家語。現在依史記的次序排列如下。註（一）是指裴駰（壯年450），史記集解引古本孔子家語。（二）集解引孔安國（壯年 130 B. C.）。（三）集解引馬融（79–166）。（四）集解引鄭玄（127–200）。（五）根據集解。（六）司馬貞（壯年727），史記索隱卷十八引古本孔子家語。（七）索隱引孔安國。（八）索隱引馬融。（九）索隱引鄭玄。（十）根據索隱。（十一）張守節（壯年737）史記正義引古本孔子家語。（十二）根據正義。（十三）根據今本孔子家語。（十四）論語邢昺（932–1016）疏引史記。（十五）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考證。

姓	名	字	國籍	比孔子少幾歲	
1. 顏	回	子淵	魯	30	錢穆據毛奇齡（1623–1716）說是比孔子少四十歲[1]。許同莘以爲是少三十八歲[2]。

* 本文爲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四本之一章，審閱人：陳槃先生。

2. 閔 損	子騫	魯四, 六	15	魯國大夫季孫氏(季康子)派他做費邑宰，他辭。
3. 冉(冉)耕	伯牛	魯四, 六	7	根據聖門志和闕里廣志少孔子七歲。祀名賢傳說他做中都宰，後來設教於洛，未必可靠。
4. 冉(冉)雍	仲弓	魯四	29六	論語子路篇第二章載他爲季氏宰，卽是季康子的家臣。皇侃(448–545)的疏說他是費邑的長官。
5. 冉(冉)求	子有 有子	魯四	29	做過季氏宰廿年以上。左傳哀公十一年說，「冉求帥左師」。
6. 仲 由	子路 季路六 季子	魯卞邑 弁邑十三	9	孔子贊他和冉求「可謂亘臣」(論語先進篇第廿三章)。孔子爲魯國司寇時，做季康子的宰。定公十二年(498 B. C.)幫助孔子「墮三都」，折毀季孫氏的費邑，叔孫氏的郈邑，和仲孫氏(卽孟孫)的成邑三個都城。孔子周游列國以後，又在衞大夫孔悝之下做蒲邑宰三年。
7. 宰 予 宰 我	子我	魯四, 六		史記列傳說，「爲臨菑(齊國的都城)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照史記索隱，「左氏(左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田闕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崔述(1740–1816)不主他們是同一人[3]。錢穆則以爲是一人[4]。
8. 端木 賜	子貢	衞	31	列傳說「好廢舉(停貯)，與時(隨

		子贛 衞賜			時)轉貨資。常相魯衞，家累千金」。又說「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覇越」。錢穆以爲這「蓋戰國策士之託詞，不足信據」[5]。孔子死，他廬墓六年。
9. 言	偃	子游	吳 魯六, 十三	45	論語雍也篇第十二章記他做魯國武城宰。崔述不信，因爲吳國離魯太遠，而且傳記沒有提到他來學于魯的事[6]。崔述過疑了。後來不是陳良北學于中國嗎？（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
10. 卜	商	子夏	衞一, 十三	44	索隱引鄭玄云溫國人。溫國今河內溫縣原屬衞。論語子路篇第十七章說他做莒父宰。列傳說，「孔子既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西河據史記索隱近龍門（現在山西河津縣），據史記正義是汾州（山西汾陽縣）。錢穆則以爲是東方相州之安陽（現在河南安陽縣），卽是河南長垣縣以北，山東觀城縣以南，山東曹州（現在荷澤縣）以西一帶的河濱」[7]。錢穆又指明魏文侯廿二年(425 B. C.)稱侯，那年子夏八十四歲，可是他未稱侯以前已經尊賢了[8]。
11. 顓孫	師	子張	陳國陽城九 實是魯人	48	呂氏春秋說，「子張，魯之鄙家也」[9]。他的先世從陳奔魯[10]。漢儒如趙岐(108–201)注孟子盡心下第卅七章說他就是張琴，是不對的。

12.	曾	參	子輿	魯國南武城	46	武城今山東費縣東南，分南北。崔述說他孔門中最年幼[11]。根據今本家語，顏商(40)和叔仲會(71)都少孔子五十歲[12]。索隱引古本家語也說叔仲會少五十歲。那就比曾參更年幼了。韓詩外傳說他做過魯國莒邑的官，「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13]。恐怕只是尊敬的話。孟子說他有弟子七十人[14]。禮記等書和諸註家說他有子思等學生多人[15]。他和有若(27)很被同學推尊，所以論語稱他做「子」。
13.	澹台	滅明	子羽	魯國武城	39 49十三	弟子列傳說，「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
14.	巫	不齊	子賤	魯二，十三	49 30六	做過宋國單父(亶縣)的宰。崔述强辯如果子賤眞是少四十九歲，那麼孔子死的時候，他只是二十五歲，孔子不能够叫他做君子。這話太沒有理由[16]。
15.	原 原	憲 思	子思	魯四，九 宋十三	36	論語說，「原思爲之宰」[17]。包咸(B. C. 6–65 A. D.) 說孔子做魯司寇時叫他做「家邑宰」。錢穆以爲那時他不過十五歲，太小。或者少三十六應改爲少廿六[18]。據索隱，孔子死後他隱居衞國。
16.	公冶 公冶	長 萇六	子長 子芝十	齊 魯六，十三		崔述以他是魯人，不是齊人[19]。孔子選之爲壻[20]。
17.	南宮 南宮	括 韜十三	子容	魯十三，二		論語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21]。漢書古今人表顏師古(581–645)注把

	南宮	紹六				南容和南宮紹當做一個人，又把南宮敬叔（111）和南宮适當做一個人[22]。崔述以南容和南宮适是一人，和南宮敬叔是兩人[23]。
	南宮	适(論語)				
	（南容）					
18.	公晳	哀	季次			沒有做官。
	公析	哀十三	季沉十三	齊一，十三		
	公哲	剋六				
19.	曾	蒧	哲	魯國武城		曾參之父。閻若璩（1636-1704）因爲論語載他坐在子路之後[24]，按定他至少比孔子少九歲[25]。
	曾	點十三	子晳十三			
20.	顏	無繇	路	魯	6	顏回（1）之父。「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26]。父子是孔子不同時的學生。
	顏	由十三	季路十三			
21.	商	瞿	子木	魯	29	弟子列傳說，「孔子傳易于瞿」[27]，不可信。詳下面第一節第六目傳經問題。
22.	高	柴	子高	衞四，九	30	子路派他做費邑宰[28]。歷來注家以他爲齊人，又有說他是衞人，後來住在魯國[29]。
				齊六，十一，十三	40十三	
23.	漆雕	開	子開	魯四，六	11，六，十二	據閻若璩，漢人避景帝諱改「啓」做「開」[30]。正義說他「習尚書，不樂仕」。錢穆疑他少孔子四十一歲[31]，似乎證據不足。
	漆雕	啓	子若十二，十三	蔡十一，十三		
24.	公伯	繚	子周	魯三，八		譙周（201-270）因爲他毀謗子路而孔子不責備他[32]，所以便「非弟子之流」[33]，太過武斷。家語沒有這個人而有申續，子周。參看下57。
	公伯	僚				
	公伯	寮				
	公伯	遼				
25.	司馬	耕	子牛	宋二，六，七		姓向名耕，或名犂。他的祖先歷代做

	向　耕				宋國的司馬。他本人當過齊國陳成子的次卿。
	司馬　黎耕				
	司馬　牛				
26.	樊　須	子遲	齊四, 九	36	左傳襄公十一年記載齊國伐魯，季孫氏抗戰，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那時樊遲才廿二歲。
		樊遲	魯六, 十一	46十三	
27.	有　若	子有	魯四, 六, 十二, 十三	13	崔述懷疑少十三歲之說，以爲他的政治活動是少壯時的事[34]。錢穆覺得少卅三歲是對的[35]。史記說，「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36]。孟子說，「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37]。這裏只說要做，未曾眞做。史記以爲事實而且加「狀似」，附會的痕跡，一目了然。論語稱他做「子」，則他受同門的尊敬，倒是眞的。
				33六, 十一	
				43十四	
28.	公西　赤				
	公西　華	子華	魯四	42	出使齊國。金鶚(1770–1819)說他使齊是在孔子做司寇的時候。那時他只是十二三歲。大概四十二是卅二之誤。而且論語載弟子侍坐言志，應該以年紀爲次序。公西華在冉有之後。冉有少孔子廿九歲，那麼公西華少卅二歲才合[38]。錢穆從其說[39]。
29.	巫馬　施	子旗	魯四, 九	30	
	巫馬　期	子期十三	陳十三		

30.	梁	鱣	叔魚	齊一,六	29	
	梁	鯉五			39十三	
31.	顏	幸	子柳	魯四	46	據梁玉繩(1745-1819)，史記志疑或
	顏	辛十三			36十一	作顏韋[40]。
32.	冉(冉)	孺	子魯			
	冉	儒十三	子魚十三	魯一,六,十三	50	
			子曾九			
33.	曹	邮	子循		50	史記志疑說，「朱氏弟子攷，闕里文獻攷，據宋封上蔡侯爲蔡人，未知是否」。
34.	伯虔		子析			
	伯處六		子折十			
			楷十三			
			子哲十一		50	
			子晳六			
35.	公孫	龍子	子石	楚四		
	公孫	龍六,十三				
	公孫	龜六		衞十一,十三	53	史記正義「孟子云趙人」。查孟子滕文公上第三章和告子上第七章兩引龍子，沒有這說。趙岐的注只是「古之賢人也」。

以上三十五人，史記說「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41]。實在下面顏高(40)，公良孺(46)，秦商(56)和叔仲會(71)都有事迹記載。

36.	冉(冉)季		子產	魯四	
37.	公祖	句茲	子之		「句」音「鉤」。
	公祖	茲十三			
38.	秦	祖	子南	秦四	
39.	漆雕	哆	子歛	魯四	
	漆雕	侈十三		魯四	

40. 顏高　子驕
　顏產六
　顏刻十三

41. 漆雕　徒父　子文十三
　漆雕　從十三　固六

42. 壤駟　赤　子徒　秦四
　穰駟　赤十三　子從十三

43. 商　澤　子季一
　季六
　子秀十三

44. 石　作蜀　子明
　石　子蜀十三

45. 任　不齊　選　楚四
　子選六,十三

46. 公良　孺　子正　陳四,六,十三
　公良　儒十三
　公襄　儒十
　良　儒六

47. 后　處　子里　齊四
　石　處十三　里之十三

48. 秦　冉(冉)　開

49. 公夏　首　乘　魯四
　公夏　守十三　子乘十三

50. 奚　容蒧(箴)子晳　衞十三
　奚　蒧十三　子楷十三

50 左傳定公八年說「顏高之弓六鈞」。家語說「孔子適衞，子驕爲僕」[42]。世家也說「顏刻爲僕」[43]，崔述硬說「然觀其事，殊不類孔子弟子」[44]。史記志疑疑是魯人。

史記志疑說宋高宗贊作爲秦人。

家語載他「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45]。世家也說孔子在蒲，「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46]。史記志疑疑是魯人。

家語沒有這個人。史記志疑說宋高宗贊作爲蔡人。

史記志疑據闕里攷以爲魯人。

51.	公堅	定	子中	魯四		史記集釋說有人說他是晉國人。
	公肩	定十三	子仲十三	晉五		
52.	顏	祖	襄	魯十二		
	顏	相十三	子襄十三			
53.	鄡	單	子家			世家沒有他。史記集釋引徐廣（352-425）說，「一云鄡單」。參看下面縣亶(80)。
54.	句(鉤)[1]井	疆	子疆十三	衛四		「句」和「鉤」古今通用。
55.	罕父	黑	子索			史記志疑說明瞿九思孔廟禮樂考以宰父出魯郡，爲複姓。
	宰父	黑十三	子黑十三			
			索一			
56.	秦	商	子丕	楚四	4十三	左傳襄公十年和家語[47]都提及他。
			不慈十三	魯六，十三		
			丕慈六，十一			
57.	申	黨	周	魯十二		論語作申棖[48]。史記索隱說「文翁禮殿圖所記又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49]。今所傳的文翁圖只有申黨，沒有申棖。劉寶楠(1792-1855)注申棖，講申棠，申黨，申儻，申棖，申續，申繚，申績很詳盡，可參考。
	申	棖	子周			
	申	棠				
	申	堂十				
	申	績十三				
58.	顏	之僕	叔	魯四		
			子叔十三			
59.	榮	祈	子祺			史記的考證用「榮」，大概形誤。史記志疑據朱氏弟子考爲魯人。
	榮	祈十三	子顏六，十五			
60.	縣	成	子祺	魯四		
	懸	成十三	子橫十三			
			子謀六			

61. 左	人郢	行	魯四		
左	郢十三	子行十三			
62. 燕	伋	思			史記志疑說闕里考以爲魯人，宋高宗贊以爲秦人。
燕	級十三	子思十三			
63. 鄭	國	子徒			「國」是避漢高祖劉邦的諱。
薛	邦十三	子從十三	魯十二		
64. 秦	非	子之	魯四		
65. 施	之常	子恒			史記志疑說朱氏弟子考以爲魯人。
		子常十三			
66. 顏	噲	子聲	魯四		
67. 步	叔乘	子車	齊四		史記考證說少叔是複姓。
少叔	乘十五				
68. 原	亢籍	籍一，六			和下面陳亢（79）不同。史記志疑說「原子必原思(15)之誤，當是魯人。
原	亢一，六				
	(冗)十二				
原	桃十三	子籍十三			
69. 樂	欬	子聲	魯十二		
樂	欣十三				
70. 廉	絜	庸	衛四		據張文虎（1808-1885）史記札記，宋索隱本作子庸[50]。
廉	潔十三	子曹十三			
71. 叔仲	會	子期	魯六	54六	今本家語說他和孔璇兩個小童常常站
			晉四，九	50十三	在孔子左右，未必可信[51]。
72. 顏	何	冉(冉)	魯四		家語無此人。
		稱六			
73. 狄	黑	晳			史記志疑說，「案家語字哲之，衛人」。
		哲之十三			
74. 邦	罣	子歛	魯四		文翁禮殿圖避高祖劉邦的諱用國選。
邦	選六				

邽　選　子飲十三

75. 孔　忠　　魯一，六　　孔子兄的兒子。

孔　弗十三　子蔑六，十三

76. 公西　輿如　子上　　史記志疑說，「朱氏弟子考以爲魯人，闕里考以爲魯人，以公西華證之，則齊人是」。

公西　輿十三

77. 公西　蒧　子上　　魯四

公西　箴十

公西　㝡十三　子尚六十，三

以下史記沒有，今本世家却有下列三人。

78. 琴　牢　子張十三　衞十三　　論語有「牢」[52]，史記集解引鄭玄說他是孔子弟子[53]。王念孫(1744-1832)以琴牢本是琴張。左傳，孟子，和莊子都用琴張，不用琴牢。他們是兩個人。琴牢始見於今本家語，是王肅（195-256)所僞造的。至於漢書古今人表的琴牢[54]，則是後人根據王肅而改的[55]。

琴　張　子開十三

79. 陳　亢　子亢　陳十三　40十三　他是史記弟子列傳所不載而見諸論語[56]唯一的人，和原亢(68)不同。漢書人名表分陳亢，陳子亢，和陳子禽爲三人[57]。

子禽十三

80. 縣　亶　子象十三　　蔡仁厚以爲「鄟」就是「鄲」，「縣」是「鄟」的簡寫，「縣」誤寫爲「縣」。「亶」「單」音近，所以互用。所以鄲單(53)和縣亶同是一人[58]。這論據似太曲折。不過鄲單之字子家和這裏字子象形近，大爲可疑。

縣　亶

上面家語所載名字，錯誤甚多。照馬繡(1620-1673)說，「諸姓名之相亂者，如「壤」之爲「穰」，「后」之爲「石」，「堅」之爲「肩」，「罕」之爲「宰」，「祖」之爲「相」，「旂」之爲「祈」，「首」之爲「守」，「伋」之爲「級」，「欻」之爲「欣」，「巽」之爲「選」，或以形誤，或以音外。」[59] 古本家語已佚，今本家語學者以爲是王肅僞造，不大可靠。

在史記七十七子以外，朱彝尊(1629-1709)和梁玉繩增加三十二人。朱氏說，「古家語七十六人。又與叔孫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子世家顏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軾(1036-1101)撰古史著錄七十九人。家語有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績，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鄒單，秦冉，顏何也。(榮捷按：鄭國卽家語之薛邦，申棠卽申績，實得四人。)益以文翁禮殿圖之廉瑀，林放，(漢)魯峻石壁像之子服何，禮(記)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閱，晏子之鞠語，墨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通共九十八人」[60]。梁玉繩有所增益，說：「若以陳亢……荀子三十二人，增入七十七弟子，通計一百九人」[61]。三十二人的姓名如下：

陳亢(79)　琴牢(80)

81. 牧皮　82. 林放　83. 仲孫何忌　84. 仲孫說　85. 孟武伯堯
86. 子服何　87. 孺悲　88. 左邱明　89. 公罔之裘　90. 序點
91. 賓牟賈　92. 顏濁鄒　93. 顏涿聚　94. 益成适　95. 鞠語
96. 季襄　97. 惠叔蘭　98. 季常　99. 孔璇　100-101. 闕黨互鄉二童
102. 廉瑀　103. 左子虛　104. 襄子孺　105. 襄子魚　106. 公子虛
107. 駟子言　108. 顏子思　109. 巫子　110. 荀子

這三十二人中有家語的陳亢和琴牢，而沒有家語的縣亶(80)，結果是一百零九人。不知梁玉繩是否以他和鄒單(53)同是一人。又沒有申黨(57)。或者是以他和申棖(57)同是一人。其中關於林放，孟武伯，顏浊鄒，和顏浊聚，應有所說明如下。

82. 林放，魯人。論語載他問禮之本[62]。鄭玄這裏的注只說他是魯人，不說他是弟子。史記索隱以文翁禮殿圖他的名字是後人所增益[63]。朱彝尊和梁玉繩都以他爲弟子，大概因曾問禮。

85. 孟武伯即是仲孫彘，魯人。孟懿子之子。曾問孝於孔子[64]。

93. 顏浊鄒，史記世家說，「如顏浊鄒之徒，頗受業者」[65]。焦循(1763-1820)以他是孟子書中的顏讐由[66]。

94. 顏涿聚，史記世家顏浊鄒下正義說「鄒音聚」。浊涿音近，所以浊鄒和涿聚同是一人。但焦循根據呂氏春秋和莊子說他是梁父大盜而卒受業于孔子，和顏浊鄒是另一個人。朱梁兩氏也把顏浊鄒和顏涿聚當做兩個人。不過朱氏加上一句，「顏浊聚或作浊鄒」，還存着懷疑。

此外還有三人，在廣義上可算是弟子的：

111. 孟懿子，即是仲孫無忌，魯大夫。據論語他問孝于孔子[67]。孔子答他不用他的名字，似非弟子。然梁玉繩以孟武伯(85)問孝是弟子，那麼孟懿子問孝，當然也是弟子。

112. 南宮敬叔，魯人。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將死，叫他的兩個兒子學禮于孔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史記世家說這是孔子年十七的事[68]。史記索隱指出孟僖子死在昭公廿四年，孔子三十五歲，史記誤了。關於南宮敬叔，崔述考證更詳[69]。毛奇齡以爲他們即曾問禮，也並不在弟子之門[70]。不過如果問孝可以做弟子，問禮也當然可以做弟子。

上面列傳七十七人，家語七十六人。其中列傳四人，(公孫寧24，秦冉48，鄡單53，顏何72)是家語所無。家語也有三人(琴牢78，陳亢79，懸亶80)爲列傳所無。史記索隱說家語刪去三人，增入三人，以補其數[71]。崔述從其說[72]。其實上面已經說過刪去不止三人而是四人。索隱又說家語有四個人(顏高即顏刻40，公良儒46，秦商56，叔仲會71)的事跡爲史記所無，這是對的。列傳「聞見於書傳」的三十五人之中，有八個人(公晳哀18，商瞿21，梁鱣30，顏幸31，冉孺32，曹邮33，伯虔34，公孫龍子35)不見于論語，而下面不見於書傳的四十二人之中，却有申棖(57)見於論語。就是說，列傳弟子見於論語的總共二十八人。列傳所無而家語所有的兩人(琴牢78，陳亢79)見于論語。論語所記也有四個人(琴牢78，林放82，孺悲87，孟懿子111)不見于弟子列傳，三個人(林放，孺悲，孟懿子)不見於孔子家語。

2. 弟子的人數 所謂弟子沒有定義，有常常追從的，也有隨時請問的，所以二千

年來有聖人七十，弟子三千的說法。最初的記載是孟子「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73]。幾十年後，韓非子便說，「仲尼天下聖人也，而爲服役者七十人」[74]，由孟子的「中心悅而誠服」變爲「服役」。同時呂氏春秋又說，「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75]。所謂達徒，是「萬乘之主得一人可爲師」，由「誠服」和「服役」又進而爲「可爲師」。淮南子雖然也說「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76]和「孔子……以教七十子」[77]，但又說「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78]。一方面把誠服和服役併合，一方面又只說人數數十，似乎比較七十少些。但大戴禮記說，「受教者七十有餘人」[79]。則又似乎多些。孔子家語不止受教育而且「入室升堂七十餘人」[80]。史記說「七十子之徒」，總共三次[81]，漢書也屢次用七十的數目，說「七十子之徒」[82]，「七十子喪而大義乖」[83]，「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84]，「七十子弟子」[85]。顏師古注「七十子喪」說，「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此說頗有道理。孟子的「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86]，是成數的好例子。假如七十子都達者而服役，則此外不是達者或未曾服役的必然很多。

顏師古所謂七十是七十二的成數，是有根據的，史記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87]。這裏呂氏春秋的「達徒」演進而爲「身通六藝」，跡近誇張。漢景帝時（156–141 B. C.）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內學宮繪七十二弟子的壁像。這個文翁禮殿圖便成爲以後孔子弟子人數的典型。後來靈帝光和元年（178 A. D.）「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88]，和以後水經注[89]，漢魯峻冢壁像（只餘殘碑），魏書李平傳[90]，和歷代太學孔子和弟子像，都是七十二人。顏氏家訓也用七十二人[91]。弟子七十二人之說是先秦所無的。數是六和十二之和，恐是巧合。劉師培（1884–1919）的言論最好。他說，「古人于浩繁之數有不能確指其目者，則所舉之數或曰三十六，或曰七十二，如三十六天，三十六宮是也。……史記封禪書管子對齊桓公語，謂古之封禪者七十二家[92]。……七十二家之數，亦係以虛擬之詞，表其衆多。莊子載孔子謂以六藝干七十二君[93]。夫孔子所經之國不過十餘，則七十二君亦係虛擬詞」[94]。

比較着實的數目是七十七，這是從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95]而來。這和世家的「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不符。但是列傳確有弟子七十七人，所以漢書跟着說，

「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96]。家語的題目雖然是七十二弟子解，但實數是七十六。或者要從史記之數而忽略了。七十二之數也許是七十七之略，以求六和十二之和。

以上是講狹義的，賢達的弟子。廣義的，普通的弟子，傳說以爲是三千。三千之說，起於史記所載「弟子蓋三千焉」，除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外，「如顏浊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97]。在淮南子裏不只是三千而是「養徒三千」[98]。正如錢穆所問，孔子何能有如此食客之多[99]？家語不但說「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而且說「自周返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100]。這便引起崔述的疑問，「是時孔子年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遽至三千乎」？[101]

三千之數，當然可疑。不過孔子生前，弟子澹台滅明已有弟子三百[102]。老師的弟子多點，也是事理之常。況且太史公之七十七人，照他自己說，「悉取論語」[103]。其中有不少是論語所未載的，可見一書決不能全載學生姓名。世家說，「孔子自周反魯，弟子益進」。又說「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104]。後來「干七十餘君」[105]。據呂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衞，所見八十餘君」[106]。那麼學生之多，比澹台滅明的生徒多十倍八倍，未嘗不可能。墨氏之言盈天下，號稱顯學。呂氏春秋舉孔子弟子及弟子之弟子六人，墨子及其弟子之弟子三人。孔子比墨子兩倍[107]。韓非子記載儒爲八，墨爲三。儒比墨幾至三倍[108]。墨子公輸篇說「弟子三百人」[109]，淮南子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110]，而知名者不過二十四[111]。孔子知名的弟子總共一百一十多人，則又差不多等于墨徒之五倍。這樣計算，以五乘墨子之一百八十，也有八九百了。又拿稷下來講。史記說有「數百千人」[112]。鹽鐵論也說「稷下先生千餘人」，但是知名的只有十七[113]。照這個比例，一千人而知名的有十七，則孔子知名的弟子過百，六倍于十七，卽是可有六千多了！後漢書儒林傳記載經師的學生由三千人到著錄的一萬六千人[114]。後來我國歷史上法師講經和理學家講學，也常常有幾百人幾千人去聽。日本朱子學派巨儒山崎闇齋（1618--1682）有門徒六千人，當然是從廣義的學生而言。我們不敢說六千或三千一定可信。但我們最少可以說，孔子的門徒特別多，又比當時，或且是以後幾百年，比任何一人爲多。這是不可磨的事實。劉師培說，「古籍以三字爲形容衆多之詞。其數最繁者，則擬之以三百之數，以見其多。其數之尤繁者則擬以三千之數，以見其尤多。……史記言孔子弟子三千，古詩三千[115]，

孟嘗[116]，平原[117]，春申[118]之客三千，東方朔用三千奏牘[119]，亦係形容衆多之詞。非必限于三千之數，亦非必足三千之數也」[120]。

3. 弟子的年歲和國籍 從表面上看，學生年齡最大的是秦商(56)。他比孔子少四歲。最幼的是叔仲會(71)。他比孔子少五十四歲。但是秦商的年歲是依據今本孔子家語，未必可靠。顏無繇(20)少孔子六歲是依據史記索隱，也有問題。伯牛(3)少孔子七歲，是根據聖門志和闕里廣志，材料更遲。子路(6)的事蹟比較多。崔述以爲他是「及門中年最長」[121]，大概可信。錢穆也主持這說[122]。叔仲會少孔子五十四歲，以下公孫龍子(35)少孔子五十三歲，冉孺(32)，曹卹(33)，伯虔(34)，顏高(40)都少孔子五十歲。澹台滅明(13)和子賤(14)少四十九，子張(11)少四十八，曾子(2)和顏幸(31)少四十六，子游(9)少四十五，子夏(10)少四十四。然而有事蹟可憑的只是澹台滅明以下幾個人，都比孔子少四五十歲。崔述說得對。他說，「史記弟子之年，不過得其彷彿而已。不可盡指爲實」[123]。不過他不信子賤比孔子少四十九歲，因爲如果這是事實，那麼孔子死的時候，他才二十五歲，不能被孔子稱做君子。他又說，子路(6)少孔子九歲，冉有(5)少孔子二十九歲，論語常常兩人並稱，年歲不應相隔這遠[124]。這似乎懷疑過甚。無論如何，孔子的弟子，老的比孔子年低十歲左右，幼的五十歲左右。如果要計闕黨互鄉二童，恐怕更幼。佛教的歷史中，有將近百歲的老禪師，門下有童年的學徒。但在佛教隆盛以前，決定未有人打破孔子這個紀錄。

至于弟子的國籍，自然是魯國爲最多，崔述說列傳著有弟子國籍的共有七人，即是顏子(1)魯人，子貢(8)衞人，子游(9)吳人，子張(11)陳人，公冶長(16)齊人，曾子(12)武城(魯)人，和子路(6)卞(衞)人。這裏崔述有誤，因爲太史公說明商瞿(21)是魯人和澹台滅明(13)是武城人。此外又有事蹟顯然，不言而喻的，即是曾子的父親曾蒧(19)和顏子的父親顏無繇(20)。所以從列傳的記載，統計魯國七人，衞、吳、陳、齊、各一人，共十一人。加上集釋，索隱，正義，和孔子家語的材料，則魯國增多三十七人[125]，共四十四人。其中九人有說是別國的。所以魯國的學生是由三十五至四十四人。衞國加多六人[126]，總共七人，其中高柴(22)公孫龍子(35)二人的國籍重複，所以是由五人至七人。陳國加多二人(巫馬期29，公良孺46)，總共三人，其中一人國籍重複，所以由二人至四人。齊國增加六人[127]，總共七人，其中三人國籍重

複，所以是由四人至七人。此外楚國有一至三人（公孫龍子35，任不齊45，秦商56），秦國二人（秦祖38，壤駟赤42），吳國一人（子游 9 ），但可能是魯人。宋國可能是二人（原憲15，司馬牛25），晉國可能二人（公堅定51，叔仲會71），蔡國可能一人（漆雕開23）。總計七十七子國籍可考的六十一人，上面所舉的材料沒有記載的十六人。統計史記注釋和家語所舉的弟子國籍是這樣的。

魯 35–44　衞 5–7　齊 4–7　陳 2–3　秦 2　楚 1–3　宋 1–2　吳 0–1

晉 0–2　蔡 0–1

如果單單依照今本孔子家語，統計是這樣的：連沒有指明國籍如曾子之父曾蒧，顏回之父顏無繇，和孔子的兄的兒子孔忠，魯國有二十二人[128]，衞國四人[129]，陳國四人[130]，齊國三人，（公晳哀18，高柴22，梁鱣30），宋國二人（原憲15，司馬牛25），蔡國一人（漆雕開23），總共三十六人，國籍不明的四十人。從上面的國籍來看，實際上學生是十國的人，當然以魯國和鄰國爲最多。所以崔述說，「孔子弟子魯人爲多，其次則衞、齊、宋，皆鄰國也」[131]。但是陳蔡頗遠，秦、晉、吳、楚更遠，也有遠道來學，崔述不能無疑，說，「吳之去魯遠矣。若〔吳人子游〕涉數千里而北學於中國，此不可多得之事。傳記所記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無一言及之？……子游非吳人明矣」[132]。然而孔子本人曾說「自遠方來」[133]，又教學生父母在不遠游[134]。中庸也說「南方之强」[135]。孟子的時候，陳良北學於中國[136]。春秋戰國周游的風氣很盛。學者遠游，何足爲怪？雖然孔子未嘗到過秦、晉、吳、楚，但不能因此便對這四國籍的七個學生發生懷疑。孔子先曾適周，後又到蔡。陳國的學生也沒有問題。那麼陳蔡再遠的吳楚和周隔鄰的晉，未嘗不可能有學生遠途來學。可怪的是鄰近的滕曹和再隔不遠的鄭國，却沒有學生。國籍多靠漢儒，尤其是鄭玄。年代相隔已遠，難免傳聞之誤。然而大體可信。倘若單以論語所載弟子爲限，孔子初期學生多是魯人，中期加上衞、宋、齊國的人。周游後又加上來自遠方的人。

4. 弟子的社會背境和活動　孔子門下非常複雜。有老有幼，有君子也有小人。論語稱「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137]。孔子贊顏子，「賢哉回也」[138]，「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139]，「其心三月不違仁」[140]。顏淵死，孔子說，「天喪予」[141]。孔子又說，「孝哉閔子騫」[142]。「子貢器（瑚璉）也」[143]。子賤和南宮适

都「君子哉若人」[144]。「起予者商也」[145]。「公冶長可妻也」[146]。「吾與點也」[147]。仲弓「犁且角（祭器）」[148]。又「可使南面」[149]。伯牛有疾，孔子嘆說，「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50]。孟子也說，「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151]。這都是君子之流。小人方面，雖然孔子批評宰予晝寢，說他「朽木不可雕也」[152]，要「鳴鼓而攻」冉求[153]，又說「野哉由也」[154]，「回也非助我者也」[155]，「師也過，商也不及」[156]。然此不過是白璧之瑕。但是據說顏涿聚是梁父（泰山下小山）大盜[157]，那眞是小人了。

孔子門下有貴有賤。貴者少，賤者多。七十七子之中，惟一的貴族是司馬牛。此外只有孟武伯，南宮敬叔，和孟懿子。其他都是平民，而且很多是貧賤的。所以錢穆說，「孔子弟子，多起微賤。顏子居陋巷，死有棺無槨。曾子耘瓜，其母親織。閔子騫着蘆衣，爲父推車。仲弓父賤人。子貢貨殖，子路食藜藿，負米，冠雄鷄，佩豭豚。有子爲卒。原思（原憲）居窮閭，敝衣冠。樊遲請學稼圃。公冶長在縲紲。子張魯之鄙家。雖不盡信，要之可見」[158]。論語載「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159]。史記載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終身空室蓬戶」[160]。以上是一幅很明顯的孔門社會背境的寫眞。「東郭子惠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161]。

他們很爲活動，成就也大。雖然有少數隱逸，原憲之外，又有閔損「不仕大夫，不食儒者之祿，如有後我者，必在汶上矣」[162]。但絕大多數是從事于社會工作。照錢穆說，「其見于列傳者，冉求爲季氏宰。仲由（子路）爲季氏宰，又爲蒲大夫，爲孔悝之邑宰。宰我爲臨淄大夫。端木賜（子貢）常相魯衞。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高柴爲費郈宰。其見于論語者，原思爲孔氏宰。子夏爲莒父宰。可以見孔門之多爲家臣」[163]。其他還有司馬牛爲次卿。又有說曾子爲莒父宰，齊相，楚尹，和晉上卿，和冉伯牛爲中都宰，不知是眞是假。但孔門弟子的顯赫，是不可抹殺的事實。傳說子路「親沒以後，南游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164]。崔述以爲「無是事也」。說他「仕于衞而死于難，何嘗有遊楚之時」[165]？又傳說曾子親沒後「南遊于楚，得尊官焉。高堂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車」[166]。這兩傳說太過相

似，形跡可疑。不過孔門中確有很高的地位和威勢，尤以孔子死後爲然。

關于他們散佈的情形，史記儒林傳說，「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衞（集解已經指出子路死於孔子之前），子張居陳，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167]。索隱註說，「子夏爲魏文侯師，子貢爲齊魯聘吳越，蓋亦師也。而宰予亦仕齊爲卿。餘則未聞」。史記儒林傳的話，漢書儒林傳全部重述[168]。

子貢在政治活動以外，商業的成就更大。他「鬻財于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169]。又「常相魯衞，家累千金」[170]。就算說他「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的話[171]，無非誇張，但他的勢力，必很雄厚。最有意義的是他們的舞場不只是齊、魯、曹、衞，而且擴濶到吳、楚、越，卽是中國全境。于是孔子之名，聞于天下。史記說，「夫使孔子名佈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172]。

儒林傳的記載，側重教傳諸侯大夫。至于他們教授學徒，則更加出色。列傳說，澹台滅明「既已受業而退。……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名施乎諸侯」[173]。據說他是武城人。錢穆以爲武城近吳。吳滅，與越鄰。越以新興，禮賢下士。……子羽南遊至江，容有其事」[174]。如上面所述，儒林傳也說他孔子死後居楚，把孔子的教旨傳播到南方。學生有幾百之多[175]。祀名賢傳又載冉耕設教于洛。這未必可信。但後來荀子說有子張，子夏，子游，子弓等等之儒[176]。韓非子又有漆雕開等等之儒[177]。可知弟子去教學的必定很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子夏和曾子。朱彝尊說，「曾子子夏門人極盛」[178]。

子夏在未赴西河以前，已有弟子。論語說及「子夏之門人小子」[179]。史記說他孔子死後居西河，卽現在山西河南的河濱，做教授，「爲魏文侯師」，文侯受子夏經藝[180]。禮記載他問樂于子夏[181]。漢書有子夏的學徒李克爲魏文侯相[182]。呂氏書秋有他的學徒段干木，不仕[183]。史記儒林傳云，「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184]。崔述以爲「此云受業于子夏之倫，則諸子非皆子夏之門人也」[185]。然子夏學徒之衆，聲勢之顯，則無可疑。

曾子弟子據孟子有子思。孟子說，「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186]。又有沈猶行[187]。大戴禮記有公明儀[188]，樂正子[189]，和單居離[190]。禮記有曾申[191]，說苑有明公

宣[192]。呂氏春秋有吳起[193]。朱彝尊以他是曾申而不是曾參的弟子[194]。註家又有陽膚[195]，子襄[196]，公明儀[197]，公明高[198]，和曾西[199]。沈猶行說，「從先生者七十人」[200]。這可能是採用孔子門人七十之數，然曾子學生之多，大概可信。

5. 弟子的思想　孔門弟子的思想，從來沒有整個的研究。因爲材料缺乏，有的也未必可靠。我們試從論語，孟子，孔子家語，禮記幾本書裏考察他們的思想是怎麼樣。我們只研究弟子的思想。他們的品格和事功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甲、論語裏的弟子思想　我們單從論語裏弟子的問話和言論來講，參加的只有十七個人[201]。問答最多的是子貢，子路，和子張。自己發表思見的有曾子，子夏，子貢，子張，和子游。所討論的題目最重要的是(一)仁，(二)君子，(三)爲政三項。其中以仁爲最多，共十七次。弟子問仁是什麼的七人，共九次[202]。孔子的訓話不在其內。從孔子的答案和他們的言論看，仁是「克己復禮」(12/1)。曾子說，「以友輔仁」(12/24)。有子說，「孝弟仁之本」(1/2)。子夏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9/6)。子貢問博施濟衆是否可以謂之仁，孔子答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6/28)。又答仲弓問仁，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2)。答樊遲的問說，「仁者先難而後獲」(6/20)。答司馬牛的問說，「仁者其言也訒」(12/3)。孔子告訴子張能行「恭、寬、信、敏、惠」五者于天下的可算做仁(17/6)，又教弟子「友其士之仁者」(15/9)。子游形容子張，「難也，然而未仁」(19/15)。子路又問管仲是否一個仁者(14/18)。仁的問答比較關於別的觀念問答爲多，連問孝問禮都比不上。仁在孔子以前，只是百善之一，孔子把他改爲百善之總名，爲全德，在中國思想史上建立一個新觀念。當時弟子屢次詰問和發表意見，是勢所必然。他們對仁已有成熟思想，如曾子的以友輔仁，有子的孝弟爲仁之本，子夏的博、篤、切、近，子貢的博施濟衆，都成爲以後孔門仁的思想之根本理論。在哲學上我們又可以說是師生討論的最大成果。

其次討論最多的是君子、士、善人、和成人　總共十七次。大部份是關於君子的性格的。子貢問君子，孔子說，「先行其言，然後從之」(2/13)。又說，「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好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17/24)。問士，孔子說，「行己有恥」(13/20)。答子路問君子說，「修己安人」(14/45)，又說，「義以爲上」

(17/23)。答子路問士說，「切切偲偲，怡怡如也」(13/28)。答他問成人又說，「見得思義，見危受命」(14/13)。司馬牛問君子，答說，「內省不疚」，因而「不憂不懼」(12/4)。子張問善人，孔子說，「不踐迹」(11/19)。問士，答說，「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12/20)。曾子以爲君子應該「思不出其位」(14/28)，「臨大節而不奪」(8/6)。子夏之意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19/9)。他又說，「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19/12)。子貢也說，「君子惡居下流」(19/19)。「過也如日月之食焉」(19/21)。子張說，「士見危受命，見德思義。祭思敬，喪思哀」(19/1)。

以上問什麼是君子五次，問士兩次，問成人一次，共八次。孔子以前的君子是指貴族和君主而言。而孔子把他道德化，平等化。君子是全德的人，人人可以爲君子。這個思想在弟子心目中沒有什麼問題。所以詢問的和談論的是君子的品格和作風。比較屢次問什麼是仁，大有不同。可知仁的觀念還沒成熟，要弄個清楚。也許仁的觀念較爲基本的，廣泛的，所以要再三請教。

再其次的話題是政治，尤其是怎樣爲政。他們問很多次。孔子的教訓是：「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15/10)。「無欲速，無見小利」(13/17)。「足食足兵，民信之矣」(12/7)。「既庶矣……富之……教之」(13/9)。「居之無倦，行之以忠」(12/14)。「尊五美，屏四惡」(20/2)。「舉賢才」(13/2)。「先之勞之」(13/1)。「必也正名乎」(13/13)。這教訓弟子全部接納，自不待言。他們自己發表的意見比較少。但曾子也曾說，「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19/19)。有子也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12/9)？子路主張「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可使有勇」(11/25)。冉求則相信「方六七十，可使民足」(11/25)。子路又說，「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諸」(18/7)？

除此三題以外，尚有問及和討論禮，孝，等等。關於禮的不過八次。但弟子的主張，都從根本上着眼。同時又有獨立和懷疑的精神。林放問禮之本(3/4)。這和君子務本，孝弟爲仁之本同一樣的基本精神。有子說，「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1/2)，爲後來中和思想立下根基。子夏問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什

麼意思？孔子答說，「繪事後素」。子夏便問，「禮後乎」(3/8)？這裏所提出的是文質問題，因此孔子贊他「可以言詩」，因爲禮是文，在質之後。孔子告訴子貢「富而好禮」，子貢便明白詩經「如切如磋」的意思(1/5)，可以說顯出詩和禮的關係。但子貢又要「去告朔之餼羊」，被孔子責他，「你愛其羊，我愛其禮」(3/17)。這裏可以見得弟子們對于煩瑣的禮節有點懷疑。宰我簡直不主張三年之喪，感覺「期已久矣。……期可已矣」(17/21)。孔子不免生氣說，「予(宰我)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實在他們符合孔子「禮，與其奢也寧儉」(3/4)的精神。根本上重禮，尤其是喪祭之禮。曾子說，「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1/9)，不特成爲曾子孝的偶像傳統所自出，而亦是後來儒家特重喪禮的來源。他們都像公西華，「宗廟之事……願爲小相焉」(11/25)。後來禮越來越雜。三年之喪，當時並非通喪，後來竟成爲一個大傳統。不過弟子的對話，大部和禮的根本問題有關。以後關于禮的多種文獻，都從這裏發揮。

同樣地，弟子討論孝的並不多。但子游和子夏都問什麼是孝(2/7, 8)。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1/2)。子夏以「事父母能竭其力，……吾必謂之學矣」(1/7)，清楚的說出學和行的關係。最奇怪的，曾子爲中國孝的典型。但在論語裏除「愼終追遠」和複述孔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的話(10/17)以外，只載他述孔子品評孟莊子之孝，以爲「他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19/18)。于孝的思想沒有什麼發明。大概他是實行家。如關于禮，他有疾也要「啓予足，啓予手」(8/4)。後來關于他的孝的傳說，都是在實行方面。

其他還有可記的是弟子問鬼神一次(11/11)，說命一次(12/5)，論學三次(11/24, 19/5, 7)，次數並不多。不是他們不着重這些，而是他們從大範圍着眼罷了。

乙、孟子裏的弟子思想　孟子裏提到孔門弟子最多的是子路和曾子[203]。其次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顏子，子夏，子游，子張，有若，曾晳，牧皮，和琴張[204]。所講的是他們的性情，而敍述他們的思想的只有兩次，就是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2下/2)，和子貢「學不厭，智也。敎不倦，仁也」(2上/2)的話。後一句是讚美孔子仁而且智，可以爲聖的，並非說仁智的意義。當然孟子直承孔子，不必求諸弟子之次。而且他思想上的爭論是針對同時的人。不過曾子的仁義並

提，可能說是孟子仁義連詞的張本。因爲孔子從來未嘗仁義並提，而孟子則仁義雙舉。這裏曾子可能是個關鍵。仁智爲儒家成德的兩翼。在論語見過好幾次[205]。孟子不特常說仁義，而且演進爲仁、義、禮、智的四德。子貢的仁智並重，也可以說是一個關鍵。

丙、家語裏的弟子思想　這書未必可靠，主要是記事和品評的材料。不過假如家語是代表孔門發展的思想，則從他所載弟子問話和言論，也可以看出第二代儒家思想從何方面開發。最多的是曾子。他問道德、孝教、親賢、禮樂、擇友[206]。顏淵問修身、成人、君子、朋友[207]。子路問君子和孝[208]。子貢問仁[209]。子路，子貢，閔子，和冉有問政[210]。子張問入官[211]。冉有，仲弓問刑罰[212]。子游，子貢，子路，子罕，公西華，子夏問禮[213]。此外子夏問詩[214]。子貢問死者有知無知[215]。宰我問什麼是鬼神[216]。子路問可否舍古之道[217]和「學豈益哉」[218]？弟子發表意見很少，只有四次。(一)曾子注重忠信和澤施百姓[219]。(二)子路說，「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貢說，「知者知人，仁者愛人」，顏子則說，「智者自知，仁者自愛」[220]。(三)閔子說，「先王制禮，弗敢過也」[221]。(四)子路說，「吾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222]。從表面上看，似乎不出論語的範圍，因爲修身治國，仍爲主題。然而詳細考察，便見到孔門有很有意義的進展。所問的關於禮特別多，問的人數也特別多。曲禮子夏問和曲禮公西華問[223]幾乎全部說喪禮。尤有意味的是子夏問三年之喪[224]。這比論語之問，何止三四倍？顯然孔子死後，禮，尤其是喪禮，成爲孔門討論的中心問題，替代了仁而爲討論的基本問題。家語問仁，只有一次[225]。而所問的不是像論語關於仁的本質的，而是比干是否一個仁者。大概仁的根本概念經已堅立，無需再討論了。討論仁智是加以分析。這一方面比論語大進一步。報福報禍爲論語所無。命的問題到第二代具體化了。子貢問死者有知無知，顯然不以孔子「焉知死」[226]爲滿意。宰我問神鬼也和孔子「子不語……神」[227]相背而馳。至於子路「舍古之道」和「學豈益哉」，已經表示一種對於尊古和重學一種懷疑態度。

丁、禮記裏的弟子思想　關於弟子言論的材料，無疑的以大戴禮記和小戴記（禮記）爲主。大戴禮記的曾子立事篇載曾子論學行、言思、和仁智等道德。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和曾子事父母四篇則完全說孝道，說「忠者孝之本。……不敢忘

其親。……三年不敢改父之道。……以正致諫，……以德從命」[228]。「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229]。「君子一孝一弟」[230]。「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故居處不莊，……孝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非孝也。……夫孝者，天下之大任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231]。又說「孝子無私。父母所愛愛之，父母所樂樂之」[232]。

這言語要和孝經比較。因爲孝經裏頭有曾子問話，所以有人以爲是他所傳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爲「要爲七十學徒之遺書。……則亦禮記之一篇」[233]，恐未必然。無論如何，孝經，的「身體髮膚……不敢毀傷」[234]……「以孝事君則忠」[235]，……「孝者，天之經也」[236]，「孝弟之道，光于神明，通于四海」[237]等等基本思想和上面曾子所說並無二致。

諸書有許多曾子孝行的傳說。首先孟子記他不特養親之口，且能養親之志[238]。以後又有其妻蒸梨不熟，不善事後母，因而驅逐她[239]。他的母親有病，他便有病，因爲他的孝道和他的母親同氣同體[240]。他斬錯瓜根，被父親用大杖擊打。他不特不怨恨，反而問他父親「得無疾乎」[241]？他每晚起床五次，看他的父親被衣之厚薄[242]等等故事。于是曾子成爲儒家孝的偶像。

大戴禮記所載曾子講各種道德如敬孝、慈惠、仁義、智忠，而主要是仁義，更特別重仁[243]，這是論語的本色。但天圓篇說到天圓地方，更說幽明、陽陽、神明、龍鳳龜火，說「靈神者，品物之本，而禮樂仁義之祖」[244]。「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245]。「聖人立五禮，……和五聲，……正五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246]。和第二代儒家其他的言論絕不相同，恐是後起時材料。

禮記關于弟子的記載，集中于檀弓，包括子路，曾子，有子，子張，子夏，顏子，公西華，子游，子貢，尤其是曾子。曾子問，雜記下，和祭義便以曾子爲主。從此可知他們是孔子的出色的門徒。他們，尤其是曾子，所問和所講的幾乎完全關于喪禮[247]，尤其是三年之喪[248]。都是關於禮節條目而不講理論。曾子問對于喪禮、婚禮、祭禮，比較側重原理，然亦只是關於制度，而不是基本原則。祭義裏則論調完全不同。

這裏言孝，反以理論爲主，說尊親弗辱能養，事君不忠非孝，孝置于天地，橫于四海，全受全歸[249]。和大戴禮記完全相同。可知是抄襲大戴禮記的。在仲尼燕居裏孔子和子張，子貢，子游，子夏談禮。特別的是仲尼閒居裏子夏問詩和問樂[250]，得到孔子「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251]，以至「風、雨、霜、露、無非教也」[252]的奇妙教旨。禮記所載，或者是後來的敷張，但原質上也上溯于子夏「可與言詩」[253]。更可注意的是禮的重要，尤其是喪禮的重要。不但這是從曾子本人嚴重禮節，如「啓予足，啓予手」[254]和病重還要易簀[255]的反映，而亦是論語弟子重視禮的必然開展。

戊、其他材料裏的弟子思想　從上面材料來看，只有曾子的言論稍有貫串，但也不能成一系統。此外有漆雕子和宓子的輯本，從說苑，孔子家語，呂氏春秋，韓非子王充（27–100）論衡等書，搜集漆雕開和子賤的事蹟和意見[256]。意見方面，重要的是性有善惡的主張，但是完全沒有言論。據王充說，主張性有善惡的是「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可知不是他們本人，而是他們的弟子。因此等到第三代再談。韓非子引子路說，「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257]。墨家氣味太濃。子路決不會這樣以利爲義的。

6. 傳經問題　傳經之說，在漢代突然發生。史記說「弟子受春秋」[258]。又說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259]。更說孔子「傳易於（商）瞿」，再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260]。索隱變本加厲，說「子夏序詩傳易義，孔子以春秋屬商」[261]。正義也引古本家語說漆雕開「習尚書，不樂仕」[262]。各經都有專家傳授。子夏不特傳詩，又傳公羊傳。一人至少傳了三經。曾子且能作經。越出越妙。關於傳經，錢穆考據最詳。照他說，漢前並無傳經之說。即史記亦僅言傳易。大概因漢博士專經授受而推以言先秦而已[263]。就以商瞿而論，「其人尚在若有若無之間，遑論傳易之事哉」[264]？到後來陶潛（372–427）居然說，「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開傳禮，爲恭德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靜精微之儒」[265]。陶潛和儒家第二代相隔七八百年，無中生有，說來有聲有色。

經學家又有子夏傳經，曾子傳道之說。以子夏至荀子爲傳經系統，漢、唐、清儒屬之。曾子經子思至孟子爲傳道系統，宋、元、明儒屬之。雖然所謂傳經，並非不同

時傳道。所謂傳道，並非不同時傳經。他們之分別在精神旨趣，而非思想之不同。可是完全沒有歷史根據，而且加强儒家門戶之見。其中子游傳大同之說，最容易顯出其造說的沒有事實基礎。禮記禮運篇關於大同的一段，就算是孔子的話，也和子游沒甚關係。在孔子講大同之前，他只站在孔子旁邊。孔子講完以後，他只問禮。對於大同思想沒有興趣。在我們上面討論弟子的思想，也只見得他問孝問禮。見不得有什麼和大同有關的思想。

7. 四科和分派　傳經之說，沒有歷史根據。孔門分派也是如此。論語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266]。孟子只舉說辭德行兩項，但德行少了仲弓。接着說，「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267]，又少冉有。所謂言語，是指利口辨詞，尤其是外交辭令應對。文學指是文學。後人引伸爲博學，詩書禮樂，或且是傳道之文章[268]。後漢書叫這四種做「四科」，「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269]？以後四科之名成爲通用。關于四科的次序，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政事二人在前，言語二人在後。索隱說，「其記有異也」[270]。鹽鐵論也把政事放在言語之前[271]。後漢書把言語放在文學之下[272]。范仲淹（989–1052）又把政事放在言語之前[273]。諸家次序不同，沒有特殊意義。韓愈（768–824）解論語這句又進一步。他把四科劃分等級，說，「仲尼立此四品。……德行科最高。……言語科次之。……政事科次之。……文學科最下」[274]。錢穆承繼此意說，「遂特尊之曰德行。自德行言之，餘三科皆其分支」，又把三科歸入德行之內[275]。李翺（壯年798）加上分級的用意，指定「仲尼設四品以明學者不同科，使自下升高」[276]。論者越來越神化。實在孔子未嘗分科。這裏用字不用名，顯然不是孔子的話而是門人複述他的意見。也只是各舉其長。皇侃疏引王弼（226–249）說，「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277]。王樵（壯年1001）之意也是如此。「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用其材」[278]。朱熹（1130–1200）也說，「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見」[279]。王弼又說，「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280]。很像這十個弟子是選出來的。果然唐開元七年（719）立他們做「十哲」，畫他們的像[281]。然而曾子有模範的孝行，何以不列入德行呢？徐幹（171–218）竟然說是「以其才不如也」[282]，無非臆

說。無怪劉寶楠評他「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283]。開元時又立曾子爲四配之一，陪孔子坐。似乎以此可能避免不入德行之困難。又因論語本章上文說「從我于陳蔡者」，有人以爲這十個人是跟孔子在陳蔡兩國。曾子不在場，當然不能加入了。依程顥（明道）(1032–1085) 的看法，「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耳。門人之聖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俗論也」[284]。「孔子厄于陳蔡的歷史問題很多。這裏不談。程子接受十人從于陳蔡之說，是傳統的看法。但他以十哲爲俗論，却是大膽。然弟子列傳從陳蔡者還有子張。此處不列。唐以前從來沒有人以十人爲從陳蔡的[285]。實在四科和孔子受厄無關。所說不必在陳蔡的時候。所以尤侗 (1618–1704) 引陳善(壯年1169)的話，「陳蔡從者豈只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286]？我們以爲先進篇除了第十和第廿一兩章以外，都是講弟子的短長，並不講他們的思想。和科目更沒關係。就令四科等于「文、行、忠、信」[287]的四教，「詩、書、執、禮」[288]或是據德、依仁、游藝[289]，然而四科之內沒有思和學。難道孔子不教這兩科，而弟子于此均無所長嗎？大概事實是孔子在某一時期或某一地點說及他們，舉其所長。不一定一時之說，更非有意分做科目的。

歷來對於孔門弟子分途，都從四科講。近年則分他們做學派。中日學者最歡喜分他們做兩宗。從年紀去分的爲前期後期。依照錢穆，「子路，冉有，宰我，子貢，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原憲，子羔，公西華，則孔門之前輩也。游，夏，子張，曾子，有若，樊遲，漆雕開，澹台滅明，則孔門之後輩也。……大抵先進渾厚，後進則有稜角。先進樸實，後進則務聲華。先進極之爲具體而微，後進則別立宗派。先進之淡於仕進者蘊而爲德行。後進之不博文學者矯而爲瑋奇」[290]。於此孔門第二代的風氣，可見一班。勞思光說子夏，子游等是早期弟子，皆從孔子學禮樂，未及親聞孔子成熟期之理論。故與晚期弟子如曾子子張等思想不同[291]。說也有理。如劉汝霖分前期弟子爲屬於政治經濟，後期弟子爲宗教人物[292]，則有問題，因爲前後期弟子都討論行政。講禮也無先後之分。

更有學者主張分內外兩派，即務外主內，或主觀客觀。兩派之說，上溯於傳經傳道之說。陸象山（九淵，1139–1193）說，「孔門唯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293]。即是說傳經由

外入，傳道由內出。蔡元培以爲有曾子子夏兩派。曾子尊德性，其後有子思及孟子。子夏治文學，其後有荀子[294]。郭紹虞跟着他說，「曾子主忠信，重本。全是主內之學。子夏學以致道，全是務外」。又引康有爲的話，「子游受微言以傳諸孟子，子夏受大義以傳諸荀子。微言爲太平世大同教，大義爲升平世小康教」[295]。然則子夏博學而篤思，又何嘗不主內呢？照顧頡剛駁郭紹虞說，「子游子夏同列文學。何以孔子的微言竟全不傳於德行政事諸科呢」？鄧公玄分一派重外在的典章文物，以子夏、子游可能爲其代表人物。一派重內省的身心修養，以曾參、子思、孟子爲其代表人物[296]。這等於說子夏、子游不重修養身心，有何可通？劉百閔說子夏博學於文，兼通六藝。後來有荀子。曾子約之以禮，獨傳一貫。到後來有子思、孟子。孔子以春秋屬子夏，以孝經屬曾子[297]。劉氏深信傳經，則子夏傳詩，也必有約之以禮的特能。可是曾子固孝，子夏亦孝。六藝則通者七十二人，不限於子夏。

日本學者的分派更極端。武內義雄因爲曾子反對子夏、子張、子游想把服事孔子的去服事有若，便說子游、子夏爲一派，和曾子一派相對峙而異其所見聞。所以他討論孔子弟子分「曾子學派」和「子游學派」兩節。結論曾子派由主觀和禮的精神入手，子游派從客觀和禮的形式入手[298]。但禮記所載曾子和子游同重禮的形式，也由此而同重禮的精神。曲禮和玉藻等編並未提及子游之名，而武內硬斷定是子游學派的學者所綴集，以完其說[299]。可謂臆造之至。平厚北堂分主觀派爲子夏、子思、孟子，和客觀派爲子夏以至荀子[300]。其論據只是因爲子夏有文學天才，其學自然有向外面矜名節的傾向[301]。我們要問：何以長于文學便有向外慕名的傾向？何以這傾向便產生了荀子？同樣的吉田賢抗以曾子由主觀而體得仁道忠恕，子游、子夏由客觀而發展禮的思想[302]。然論語所載子夏說禮也說仁。試問他是主觀還是客觀？森光雄由四科來分派別。以德行爲主，由曾子而至子思、孟子。以文章爲主，由冉雍、子夏而至荀子。又分曾子、子思，孟子爲主觀派，子夏、子游、荀子爲客觀派。四科冉雍(仲弓)明明屬于德行，此處則屬文章，眞是莫明其妙。狩野直喜則從傳經着眼，以曾子學派爲孔門正統，功在傳道。子夏學派功在傳經[303]。如果傳經可信，孔子不曾以孝經屬曾子嗎？

此外更有學派對攻之說。侯外廬不特分弟子爲前輩後輩。前輩問學于孔子去魯之先，計有子路，宰我，子貢，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原憲，子羔，公西華等

人。後輩從游于孔子返魯之後，計有子游，子夏，子張，曾子，有若，樊遲，漆雕開，澹台滅明等人，韓子，荀子所述皆是後輩。侯氏更說子張別立宗派。有若、子游亦似各有立宗派的趨勢。他所舉的「例證」只是弟子意見分歧，或彼此之間有所評議[304]。這樣極端而言，則弟子可人人自爲一派了。劉汝霖以爲韓非子所述八派之中沒有子游，子夏，和曾子，是因爲他們三個人都是孔門的正傳，言必稱師，所以不必別立宗派。但劉氏又說四派互相攻擊，卽是曾子攻子張，子游也攻子張。曾子攻子夏，子張也攻子夏[305]。由同門有所品評而斷爲攻擊，由攻擊而斷爲學派對壘，可謂想像靈敏之至。

至于梁啓超（1873-1929）之分孔門五派，是不限于第二代，但是從孔門弟子出發，所以現在順便討論。他的五派是：(1) 內業派。以莊子之子桑戶，孟子反，和琴張，「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似皆與孔門有淵源。孟子言「琴張，曾晳，牧皮，孔子之謂狂」，頗與顏回同一氣象。管子的內業篇講儒家存養之學，和道家大同小異。大學言知止、定、靜，中庸言至誠，盡性，卽屬這派。至孟荀兩家論性觀心之說，而這派大成。(2) 武俠派。子路間强，漆雕氏「不膚撓，不目逃」，皆屬這派。其末統和墨家結合。(3) 經世派。子夏弟子李克爲經濟專家。這派至孟荀而分途發展。(4) 文獻派。重歷史觀念。其中甲派比較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如大小戴禮記就是。乙派專從事于政治，如左丘之作國語就是。(5) 傳注派。這派溯源于子夏。後來商瞿之于易，公明高之于春秋都是[306]。梁氏東湊西合，一目了然。子張問十世[307]，宰我答哀公問社，說「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308]。子思也說文獻，何以不屬文獻派呢？曾子任重而道遠[309]，何以不入武俠派呢？經世又何止子夏弟子？凡從政的都是經世。總之，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同時孔子弟子「各言爾志」[310]。說弟子志趣不同則可，說他們建立派別則不可。這樣宋明門戶之見，大有背于孔子和孔門的精神。

二、大學

我們屢次提出孔門弟子的思想雖有進展，但沒什麼統系。爲什麼又產生思想井然，次序齊整的大學？這問題不容易解決。文體的發達是很玄妙的。論語沒有秩序，而春秋倒是格局嚴整。孟子和荀子同時，而孟子爲對語體，荀子爲論文體。大學之出

于弟子，並非絕不可能。

大學是儒家的重要典籍。韓愈的原道[311]和李翺的復性書[312]都特別引他做儒家的基礎。程頤（伊川，1037–1107）看他做「入德之門」[313]。朱子以他是「修身治人的規模」[314]和「定世立教之大典」[315]。由于大學，「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于世」[316]。因此他十分重視大學。先著大學章句，隨後又著大學或問去闡明他註大學的哲學理由。他死之前三日還修改註大學的誠意章。他于紹熙元年（1190）把他和論語，孟子和中庸刋爲四子書，成爲以後中國教育之基本教材。王陽明（守仁，1472–1529）著的大學問[317]，無疑地是他的哲學中心。他的弟子錢德洪（1496–1574）說，「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318]。

大學是禮記（即小戴記）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鄭玄作註，孔穎達（574–648）作疏。據劉向（77–6 B.C.）的別錄，「大學屬通論」[319]。北宋仁宗（1010–1063）天聖八年（1030）賜進士王拱辰（1012–1085）大學軸[320]，想是大學首一次的單行本。不久就有司馬光（1019–1086）的大學廣義一卷，司馬光等六家的大學解義一卷。喻樗（1129卒）的大學解一卷[321]。以後專注大學的更多。程顥，程頤兩兄弟各自改正大學本文[322]，顯然要把他離開禮記而獨立。

1. 著者問題 關于大學的著者爲誰，宋以前沒人說過，鄭玄雖然說禮記是「七十二子之徒」所共撰[323]，但不明言大學的著者是誰。程顥說「大學乃孔氏遺書」[324]。這是指孔門，也不能確定著者是誰。指定作者以朱子爲第一人。他先前曾說孔子「筆之于書。……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325]。二十年後（1189）才斷定「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326]。門徒問他怎樣知道，他答說，「正經詞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竟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于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于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矣」[327]。這裏「則知」「無疑」，實在也「無左驗」。朱子也說「蓋」，表示懷疑。雖然大學第七章引曾子之言，那不一定是弟子所述。不過後來朱子的話，便成定論。第十章「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和大戴禮記「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民益悌」[328]相似。這是孔子告曾子的話，不能拿來做曾子作大學的證據。張華（232–300）引曾子「好我

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329]的話，和大學第八章「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詞句相同，翟灝(1788卒)似以此可證爲曾子所作[330]。因爲朱子說曾子門人記之，于是宋人王柏(1197–1274)斷定這門人是子思。理由是曾子門人之中「孰有出于子思之右」[331]？明人豐坊(1523進士)僞造石經大學刋行。鄭曉(1499–1566)爲他宣傳，說魏政和中虞松等考正五經，鍾會(225–264)等刻之于石。虞松的進表引賈逵(177–228)的話，說子思窮居宋，作大學[332]。也曾和鄭曉同事的陳耀文(壯年1550)已經指出魏沒有政和年號[333]，虞松也沒有考證五經的可能。實際上魏書沒有這個人。後來毛奇齡，朱彝尊等也發露豐坊的虛構[334]。胡渭(1633–1714)跟着王柏也說大學成于子思之手。理由是：「中庸大學爲出類拔萃之作。中庸出于子思，更誰能與子思匹而能作大學乎」[335]？崔述則以爲「大學之文繁而盡，又多排語，計其時當在戰國，非孔子曾子之言也。然其傳必出于曾子」[336]。近人唐君毅則把大學放在荀子之後[337]。錢穆相信是秦漢之際無主名之作品[338]。近人比前人越來越後了。

2. 經傳和改本　孔穎達在他大學的疏指出某某章「此經大學之道。……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覆說前修身正心之事。……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339]。但朱子比較分明。他注大學第十章說，「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朱鶴齡(1606–1683)說「伊川始分經傳」[340]，是揣度之詞，並非事實。朱子分經傳，後儒有所批評。陳澧(1810–1882)爲他辯護，說詩經豳風七月首章鄭(玄)箋云，「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先有成例[341]。陳槃更舉管子心術上篇劉績(壯年1500)注說，「按此以上皆經，下釋其義」[342]，多添一例。徐復觀因爲康有爲不滿意朱子「誤分經傳」，說「一篇中豈能自分經傳乎」[343]？認爲康氏固陋。因爲戰國末期著書的通例，有經有說。如韓非子內外儲諸篇，自分「經」「說」。管子，呂氏春秋兩書中也有這種情形[344]。

朱子不特分經傳，而始又補第五章的傳，共一百三十四字。說「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所謂竊取其意，只是竊取程頤格物之意，不是取程子補傳之意。補傳究竟是朱子自己的大膽作爲，不問有無前例[345]。這裏的格物思想，後來王陽明極力反對。同樣地，王氏又反對程朱之改本。首先更改本文的是程氏兄弟。他們認爲古本有錯簡。于是以自己的意思移易章句。程頤改「親民」爲「新民」，又加「此謂知本」，

說是衍文[346]。朱子採用程頤的改本，但移易本文，別爲次序[347]。程朱之後移動本文的有幾十家，由王柏，黃震（1213–1284），董槐（壯年1254），葉夢鼎（1273以後），宋濂（1310–1381），方孝孺（1357–1402），蔡清（1453–1505），程敏政（壯年 1466–1499），崔銑（1478–1541），顧憲成（1550–1612），高攀龍（1562–1626），劉宗周（1578–1646），張履祥（1611–1674），胡渭（1633–1714），張伯行（1651–1725）等等，以至近人唐君毅，皆有改本[348]。王陽明反對程朱改本而要「去分章而復舊本」[349]。這舊本並非上面所舉虞松的石經大學而是小戴禮記的大學。假造石經大學中間竄入「顏淵問仁」至「非禮勿動」等事，不是本來面目[350]。舊本是鄭注孔疏十三經本。王陽明要「以舊本爲正」，又要「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補之傳」[351]。特別反對二程子和朱子改開章首句「作親民」爲「作新民」[352]。我們以爲移易章句，改寫補傳之類，作爲注疏以爲研究則可，作爲恢復原文則不可。我們不知道著者究竟是誰，又怎能知道他的原文是怎麼樣？

3. 大學的思想 朱子說，「大學者，大人之學也」[353]。又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354]。大人是成年的人，大學是大人的學校。表面上和鄭玄的「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355]似乎不同。其實三說相通。照古時儒家的想法，凡年十五，應該入高等學校，學做「學成之事，能治其國」[356]的人。大學開章明義便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是宋儒所謂「三綱」。下面又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是宋儒所謂「八條目」。普通討論大學的都集中于綱和目。但中間又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裏定、靜、安、慮、得五個步驟，表達心性的步步進程，是儒家從來未有的新思想，而所謂本末、始終、先後和這經文最後一句所說的厚薄，也是一個新穎的比較價值的看法，遠出乎論語之上。因此朱子屢次說大學是個大規模[357]，「如行程相似」[358]，是「爲學綱目」[359]。胡適(1891–1962)以爲大學中庸兩部書最重要的在于方法一方面。本末、

始終、先後，便是方法問題[360]。朱子要人「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361]。

朱子和王陽明相反之處很多，成爲儒家理學和心學兩大對壘。但他們對明德的觀念却無二致。朱子解「明德」爲「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362]。明德是指「仁、義、禮、智之性」，「全體之妙」[363]。陽明也說「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謂之明德」[364]。明德的觀念，並非突出。尙書堯典有「克明俊德」，大學第五章所引論語的大德[365]，是對小德而言。但「至德」[366]顯然是全德，亦卽是論語「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367]之德，卽是論語之仁，亦卽是大學本文下面的「至善」。新的元素是在于第一個「明」字。這裏「明明德」和左傳襄公十九年的「昭明德」微有不同。左傳昭顯先祖的明德，這裏昭顯自己的明德。自己的明德是有論語性善的含義。至于怎樣去明，在朱子要「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也且慢慢地自見得」[368]，「當于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369]。本性既明，我們便能見這性了。朱子和陽明的分別是朱子着重理會，陽明則着重「光其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370]。他們出發點和方法不同，目標則一。

大學之第二步是親民，等于論語爲仁之方，己達達人，己立立人[371]。先把自己的本性實現，隨而推及他人。在爲政方面，當然是親民，下面引詩經「樂只君子，民之父母」[372]，和說「保我子孫黎民」(10)，就是此意，亦卽是論語的老安少懷[373]。陽明說堯典「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和論語「修己以安百姓」[374]，便是親民[375]，是很對的。程子改「親」爲「新」[376]，朱子從之，解說，「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377]，「使之去舊汙」[378]。陽明以人性爲物欲所蔽，對於革舊之說，自然贊同，但改「親」爲「新」則十分反對。他要回復古本的「親」字，因爲下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3)，「如保赤子」(9)，「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10)之類，皆「親」字之意[379]。朱子則以爲「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380]。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381](2)，是釋「新民」的。「克明俊德」(1)，朱子之說，是釋「明明德」。「惟民所止」[382](3)等等是釋「止于至善」，也是順理成章。「親」是從心性方面而言，「新」是從效果而言。兩說可以並行不悖。

至善的概念本來是很簡單，不外朱子所謂「極好處」[383]，如韶樂之盡善盡美，「事事皆有之善處」[384]。卽是「事理當然之極」[385]。陽明則不特是說「明德親民之極明」[386]，而更說「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387]，是「心之本體」[388]。他引朱子註，「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389]。所謂止，是朱子所謂「必至于是而不遷」[390]。就是大學的「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5)。這裏朱王兩家並沒什麼衝突。

從明明德到止于至善的路線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從內至外，從小至大，有條不亂。這是論語找不到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當然是孔子所常談。但由個人而國而天下，比較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較有層次。論語「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391]，「修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392]，似乎也是由個人而逐漸擴大到全社會。但總比不上大學的整齊清楚。至于格、致、正、誠，便完全是前所未有。

格物致知的「格」，引起宋明清幾百年的爭辯。鄭注根據尙書「格于文祖」[393]和「有苗格」[394]，訓「格」爲「來」，說「其知于美深，則來美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緣人所好來也」。朱子說，「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所不到也」[395]。把「至」不解作「來到」而作窮極的「至」。他是根據程頤的話，「極，至也。窮理而至于物則物理盡」[396]，「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397]，和解大學格物句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窮其理而已也」[398]。陽明反對這說，堅持「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399]。他是根據孟子「惟大人惟能格君心之非」[400]。解「格」爲「正」，實遠溯于尙書的「格其非心」[401]。論語的「有恥且格」[402]，可以解「來」，也可以解「正」。這是宋明理學格物分途之遠因。

朱子主張窮理，于是大膽補上第五章的傳，並且編定章句。把格致章(5)放在誠意章(6)之前。陽明反對朱子的編章，要從舊本，卽誠意在格致之前。他以「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403]。那是他們哲學出發點的不同處。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誠的觀念的發源，就是大學。因爲論語裏面兩個「誠」字，都指「當眞的」[404]。勉强可以說論語

「修己以敬」[405]的「敬」和「誠」相類。因此之故，後來理學家常常誠敬並提。不過畢竟敬是嚴肅，誠是眞實。所以陳淳(1153-1271)說，「誠與敬字不相關」[406]。大學的誠是新出的。這是必然的發展，因爲從上頭的格物到下頭的正心，假如沒有眞實的意，是做不到的。沒有眞誠，物不能格，心也不能正。這思想到中庸更發揮光大。這心理的需求，也許是論語只言正身[407]，而大學則言正心的原故。

這心理方面的發展，便引到定、靜、安、慮、得的五層次。從細目上可以說都有論語的根據。普通的有「思無邪」[408]「內省不疚」[409]「三省吾身」[410]。個別的有「血氣未定」[411]，「仁者靜」[412]「仁者安仁」[413]「恭而安」[414]，「人無遠慮」[415]，「求仁而得仁」[416]。不過此等最多只是提示，沒有大學次第的逐步進展。大學特重心理，所以愼獨和自慊(6)，對中庸，孟子以及明儒發生重大的影響。這個發展，無疑地是因爲大學的心理思想比論語大進步。胡適早已說過，「最早的儒家只注重實際的倫理和政治，只注重禮、樂、儀節，而不講究心理的內觀。……到了大學，便不同了。大學的重要心理學說，是在于分別心與意」[417]。這是很適當的言論。胡適又表出大學的方法。說「本末、始終、先後、便是方法問題」[418]。我們敢進一步說，這不只是方法而且是程序和規模。因此大學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經文)。由論語的「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孰先傳焉？孰後傳焉」[419]？而歸結于大學的「知本」(2-5)。論語有「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420]，「禮之本」[421]，「仁之本」[422]。所不同的，在大學有規模，而知本是規模的軸心。所以毛奇齡著大學知本圖，第一個標題是「大學有本」[423]，還在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之前。

什麼是本？大學說「皆以修身爲本」(經文)。王以誠意爲本，是修身內的事，實沒有抵觸。由個人出發而一面格、致、誠、正，一面修、齊、治、平。胡適說是特重個人[424]，是有見地。不過修身和事親並非如胡適所謂相反[425]。儒家哲學，沒論原始或蛻分，早期或後期，都是個人和社會並重，就是己立立人之旨。在論語這是「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426]。在大學這是「絜矩之道」(10)。朱子解說，「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正所謂絜矩者也」[247]。卽是大學說，「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

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10)。凡大學「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9)，「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10)等等，皆從絜矩而出。所可注意的，中庸的「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428]，不外直述論語。[429]大學却有個絜矩方式。從內容而論，究竟不外是以忠恕爲一貫的仁。所以大學是儒家的正統。其所發展皆以孔子的仁爲樞紐。雖然論語常常講及的孝、禮、君子，在大學少見，表面上有點可異。實際上他們皆在八個條目之內，並非大學有所忽略。這正統通過中庸而到孟子，形跡顯然。關於大學和中庸的關係，在下節中庸的思想才說。現在先說孟子。

孟子的「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430]，簡直是從大學而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431]，和大學的「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10)差不多是一樣。「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432]，也是如此。其目的相當于大學的平治天下。孟子的「于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433]，朱子說是本于大學[434]。孟子又有「始條理」和「終條理」[435]，「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436]。孟子特別注重「一本」[437]，又嚴分義利[438]都和大學相同。孟子的誠[439]，雖是從中庸而來，但「反身而誠」[440]，究竟和誠意無大分別。其「不動心」[441]可以說是大學的定、靜、安。「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442]，亦等于大學的自慊。「格君心之非」[443]是陽明解大學格物所本，更無待言。朱子說「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愼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並無不脗」[444]。當然大學和孟子可能同出一源，或竟是大學採用孟子。然儒家不一定是直線發展。誠如朱子所云[445]，大學的定、靜、安、慮、得，上不及孔子的由志于學而從心所欲[446]，下不及孟子之善、信、美、大，以至于聖而神[447]。但從全部比較來看，大學除誠意外，皆是依論語而來。大概要再待百餘年到孟子才發展。

不少學者又說大學採用荀子，是在荀子之後。如馮友蘭之主張大學須從荀子之觀點解釋之[448]。舉出荀子「止諸至足」[449]來比併大學的「止于至善」，荀子的「虛壹而靜」[450]來比大學的「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7)。我們又可以指出荀子的「此其誠心莫不求正」[451]，實在和大學更近。徐復觀于馮氏所舉之例之外，增入明德一項，及指出荀子「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452]，「靜」[453]「如保赤子」[454]和「如養赤子」[455]各點，斷定大學之作者必受荀子的影響。唐君毅也說大學言「止」，文句

有類荀子，故大學當在荀子後[456]。從這幾點，我們只可以說荀子和大學相同，並不能因此便斷定其因果關係。然而相同亦不過區區如此而已。他們相異，又何止數倍？就如唐君毅所說，荀子沒有內在之明明德觀念的。

三、弟子的弟子——第三代

七十子之弟子可考的除上面曾子和子夏的弟子以外[457]，有子貢的學生田子方[458]，子賤的「似是學生」的景子[459]，和閔子的學生孟嘗君[460]。漢書藝文志又有「七十子之弟子」的世碩，公孫尼子[461]，芊子，和「漆雕開後」的漆雕子[462]。但隋書經籍志說，「尼似孔子弟子」[463]。據朱彝尊考據，弟子的弟子共三十一人，卽成囘，駔臂子弓，橋庇子庸，魏文侯都，段干木，田無擇子方，高行子，曾申子西，公羊高，穀梁赤，子思，樂正子春，檀弓，沈猶行，陽膚，公明高，公明宣，單居離，公明儀，子襄，公孫尼子，世碩，景子，王史氏，李克，芊嬰，公孫段，懸亹父，公休哀，公祈哀，盆成掠。朱氏似乎以駔臂及由魏文侯至穀梁赤爲子夏弟子，子思至子襄爲曾子弟子。公明儀又有人以爲是子張的弟子[464]。可惜關于他們的材料不多。我們只能從有限的材料去探索他們的思想。先從曾子的弟子說起。公明儀以文王爲師[465]，又問孝于曾子[466]。樂正子不僅問孝而且複述曾子全受全歸之言，可以說是他自己的意見[467]。曾子告子襄以大勇之道[468]。公明高論孝子之心[469]。陽膚問政于曾子[470]。曾申問哭泣[471]和述曾子哭泣之哀[472]。他們不外述曾子之意，沒新見解。其他如沈猶行和公明宣等均沒有學說。倘若我們相信大戴禮記的曾子天圓篇是可靠的，則單居離問天圓地方[473]，眞是別開生面，是儒家所罕見。至于他問事父母之道[474]，則當然是曾子的傳統教訓了。

子夏的弟子李克，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都沒有學說留下來。史記稱魏文侯受子夏經藝[475]。據馬國翰（1794–1857）所輯材料[476]，知道他問古樂[477]，說治從身始[478]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479]，仁者國之寶，智者國之器[480]。馬氏稱他「湛深儒術，而容直納諫之高風，尊賢下士之盛德，尤足垂範後世焉」[481]。但在思想上不見得對於子夏的思想有什麼發明。他談詩[482]「令人孝慈之心油然而起」[483]。這樣不特和子夏一樣，「可與言詩」，而且出乎子夏繪先禮後[484]思想之上。

李克爲魏文侯相[485]，教人「卑不謀尊，內不謀外，疎不謀戚」[486]。「貴而下賤，

……富而分貧，……知而教愚」[487]。公孫尼子[488]主張「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之于心」[489]，修身要知命，行善必有報[490]，有似孟子。「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491]，近于淮南子[492]。「聖人役物而忘情」[493]，且近西晉玄學。又有養氣之說和性有善有惡之說[494]。恐是後人綜雜之話。世子卽是世碩[495]。除說「莫美于恕」[496]外，據王充說，「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成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497]。漆雕子[498]也說性有善惡[499]。

綜合上面之弟子卽第二代進一步者(一)性有善惡。(二)孝。(三)禮。(四)天地與人的關係和陰陽。(五)詩。(六)心和養氣。其中關於性，天人關係，和養氣，是比較第二代的弟子思想前進一大步。孔子的弟子跟着孔子，對于人性只有涵義，並無直說。現在則說出有善有惡。或者是從孔子性相近[500]出發。第二代的思想全是關於仁、君子、倫理、政治、禮教的問題。第三代則出乎人間範圍以外而擴大到天地的範圍。大學的心理思想也進而爲養氣、忘情。都是做孟子以後儒家思想的伏線。雖然文獻太少，我們不能附會。但單從討論題目，已經見得早期儒家層層之進展。他們幾個重要思想，都成爲中庸的主題，而中庸亦成爲第三代最完整的發展。

四、中　　庸

中庸和大學一樣重要，所以宋仁宗也贈進士王拱宸中庸一軸，張戴(1020-1077)見范仲淹，范氏知其器遠，勸他讀中庸[501]。程頤稱「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502]。中庸是禮記第三十一篇。老早就引人注意。宋戴顒(378-441)著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502-549)著中庸講疏一卷，又張綰，朱昇，和賀瑒體聖旨作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到唐李翺著中庸說一卷[503]。以後宋明的註很多。其中最重要而又是最通行的是朱子年六十(1189)所序的中庸章句。他沒有更改原著的次序，但分做三十三章。紹熙元年(1190)他把大學，論語，孟子和中庸刋做四子書，稍晚又著中庸或問。

1. 中庸和子思子與中庸說　這篇中庸和子思子與中庸說是否同一，還是未決的問題。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504]。沈約(441-513)說「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505]，似乎中庸來自子思子。史記公孫弘傳說，「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503]。索隱說，「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記中庸篇」，可作一證。舊唐書經籍志還有子思子八卷[507]。但子思子至宋朝只餘一卷[508]。王應麟（1223–1296）漢書藝文志考證在上面所引沈約的話之下註說，「今有一卷，乃取諸孔叢子，非本書也」[509]。明世善堂藏書目錄記子思子七卷，不知是否隋唐之舊[510]。後來眞的僞的都失了[511]。

漢書藝文志又有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說[512]，「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顯然以爲和子思子是兩本書。王柏據此以爲兩書到小戴氏的手裏亂了。他說，「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其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尙見其爲二也。合而亂之，其出于小戴之手乎」[513]。他的意見以爲中庸說是中庸的注。現在中庸說已經不傳。徐復觀以爲孔子世家的中庸，漢書藝文志的中庸說，和白虎通所舉的禮中庸記[514]，可以看作一書[515]。

2. 中庸的作者和章節　中庸向來以爲是子思所作。據孔叢子「子思年十六適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516]。史記孔子世家則以「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517]。禮記中庸篇孔穎達的正義引鄭玄說，「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于〔劉向的〕別錄屬通論」。以後沈約，陸德明（556–627），[518]和朱子都相信子思作中庸的傳說。朱子的話是，「子思恐其〔傳授心法〕久而差也，故筆之于書」[519]。但是歐陽秀（1007–1072）老早便懷疑子思作中庸。他以爲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傳其眞，而其說有異」[520]。所以關于這傳說發生很多問題，有關于年齡的，有關于中庸詞句的，有關于中庸思想和體裁的。關于年齡的，顯然年十六和六十二相衝突。世家所載的年六十二，學者以爲是作中庸之年。但世家上文「伯魚年五十」和下文「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都指一生之年。而且「嘗」字也指一生中之一事而不是六十二歲那年的事。可知子思不是六十二歲作中庸的[521]。但十六仕衞，仍覺得太早，是以毛奇齡以爲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誤[522]。這也是猜度之詞。

關于詞句，第三十二章「仲尼祖述堯舜」之語，一定不是孫兒的話。三十章「有宋存焉」之語，和論語「宋不足徵」[523]的話，大相違背。閻若璩疑其「殆爲宋諱」[524]。但此說太過牽强。最大的問題是「車同軌，書同文」(30)的話和「華嶽」(26)一詞。華嶽離宋太遠。同軌同文，不像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前的話。于是葉酉（1799進士）斷

定說「華嶽」的必定是長安之人，故中庸是漢人所作[525]。但洪邁（1123-1202)列出列國詩歌，證明古代詩同文，又舉左氏所傳相同名字，以證三代書同文[526]。陳槃也指出左傳隱公元年「同軌畢至」。始皇琅琊台刻石說「普天之下，同書同文」。又「華嶽」釋文說，「本亦作『山嶽』」[527]。徐復觀更查出齊境原來有華山和嶽山[528]。可知同軌同文和華嶽的問題，並非不能解決。沒論事實如何，我們總覺得單從一兩詞句來確定中庸的時代是靠不住的。

關于思想和體裁的，陳善的捫蝨新話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19)以下一段，乃漢儒讀論語或問禘之說[529]，因爲本章上文有「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因而立說，說出下面「郊社之亂，禘嘗之義」，于是斷定是漢儒之雜說[530]。崔述言之更詳。他說，「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實切于日用。……中庸獨探賾索隱。論語之文簡而明。……有子曾子門人所記，正與子思同時。何以中庸之文獨繁而晦？……『在下位……』(20)以下十六句，見于孟子。……孟子何以獨述此語？……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蓋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爲書。……中庸之文採之孟子」[531]。俞正燮（1775-1840)則信子思實著中庸，漢儒有所更改[532]。俞越(1821-1906)以篇中「子曰」爲漢儒所附加[533]。胡適從思想立場以大學中庸爲四世紀三世紀初期儒家，由中庸的倫常發展到孟子個人主義，由君權到民族，由實際人生哲學到孟荀心理哲學，都有線索可尋。所以中庸必是孟荀以前的書[534]。馮友蘭從文體立場，以爲首段和末段大概是論著體裁，中段大概是記言體裁，因而推測中段爲子思所作，首末兩段爲後人所增加。其論命、性、誠、明諸點，較孟子爲詳，是秦漢時孟子派所作[535]。徐復觀舉出五個理由，說明中庸在孟子之前。理由是：(一)孟子五倫以父子爲首，比中庸以君爲首進步。(二)中庸知、仁、勇至孟子爲四端。(三)仁重自覺，近論語，孟子則以愛言仁。(四)未明言性善，孟子則明言。(五)中庸言愼獨，孟子則言求放心、存心、養性、養氣。後來加以補充修正，也以爲是子思之作。但第二十章前半段以前有若干章和第二十章後半段以後全文都是禮家所插入去的[536]。諸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以爲從思想的大體而言，中庸爲子思或子思系的人所作，不是絕對不可能的。勞思光又說中庸有「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話，不是早期儒家所說，因爲早期儒家是尚古的[537]。但是中庸的全部的仍是尚古，贊美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30)。尚古之中，未嘗不可有一點反

古精神。上面提出子路問可否舍古之道[538]，可見一班。總之，中庸編集的問題，多未解決。朱子答中庸編集得如何，說，「便是難說。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539]。

關於中庸的章節，也是各異其說。孔顥達分古本中庸做三十三章，但毫無頭緒。第八九章關係很少，但孔氏合併爲一章。第二十八，二十九章以「故」字起有乖文法。他又把第十四章的「射有似乎君子，……反求諸其身」以下和講父、母、妻、子的第十五章合爲一章，顯然不類。朱子不更改章數和次序，只根據內容而分節。節之長短不同。有幾章加上簡單的說明，結果層次分明[540]。王柏說，「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章」。他依朱子的中庸章句分三十三章，以第一至第二十二章爲上篇，釋中庸；第二十至二十三章爲下篇，釋誠明[541]。諸家分節很多，由晁補之的八十二節最繁到景星五節最簡[542]。最近徐復觀劃分詳細，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爲上篇，餘爲下篇。但第二十章應依據禮記正義，以前五百五十九字爲一章，後二百零六字又爲一章。上篇主要是解決孔子的實踐性地倫常之教和性與天道的關係，主要是引孔子的話以爲其骨幹。下篇是以誠的觀念爲中心而開展的，完全是作者話[543]。徐氏觀察可謂精明。但我們敢說學者把中庸看作一篇像八股的整齊的文章是錯誤的。他不是一時之作，也許不是一人之作。古書大體如此。錯誤難免，夾雜的材料也難免。我們只可從他的思想大綱去尋找思想的變遷罷了。

3. 中庸的思想　中庸書名，依據鄭玄的解釋，「名中庸者以其中和之爲用也」[544]。中和概念來自中庸本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1)，由中的概念而伸到和的概念。論語用「中庸」的只有一次，就是「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545]。這個「中」是上溯於尚書大禹謨的「允執厥中」，即是論語堯曰篇所引的「允執其中」[546]。無論堯曰篇是眞是僞和大禹謨是遲是早，「中」字的意義是很明顯的。論語的「中行……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547]，「過猶不及」[548]，「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549]等等，無非中的意思。即是後來程子所說「不偏之謂中」[550]。朱子跟着也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551]，是「恰好處」[552]。又在質的量的無過不及之上，添加隨時而中的意思，說「大旨在時中上」[553]。接着又說，「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554]。

未發之中是體，發而時中之中是用，中「自兼體用言之」[555]。

「庸」，鄭氏解作「用」，和古經相符。但他又解「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556]。所謂常，看他釋「庸德之行，庸言之謹」(14)，說「德常行也，言常謹也」，分明是「常常」的意思，似乎和「用」的意思不同。程頤說，「不易之謂庸」[557]，「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是天下不易之理也」[558]。那麼「常」又是「常久」的意義。朱子以「常」爲「平常」[559]，爲「日用常行者」[560]，和程子固然不同，和鄭玄的「用」，和「常常」也相差。所以他的門徒懷疑問他。他回答說，「惟其常也，所以不易」[561]，「惟其平常，故不可易」[562]，「中而後能常。……常而後能中」[563]。于是「用」、「平常」、「常常」、「常久不易」成爲一而四，四而一。

中庸說中庸實在是含有這各方面的。「擇乎中庸」(7.8)。「依乎中庸」(11)。「中庸不可能也」(9)。「中立而不倚」(10)。「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4)。和「用其中于民」(6)。都是論語的「無過不及」。無怪直引論語「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3)。「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言顧行，行顧言」(14)，兼有平常和不偏兩義。「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1)，則又兼不偏和長久之意。「君子而時中」(2)，即朱子所謂「隨時以處中」[564]，又加上時間性。到「不勉而中。……從容中道」(20)，和「極高明而道中庸」(27)，可以說是總其成。

從中庸的兩面看，中是體，庸是用，其關鍵是在中和的觀念。朱子說「中字兼中和言之」[565]，即是兼體用而言。所以中和庸是不分的。後來中和問題成爲理學一個熱烈討論的主題。伊川和蘇季明（壯年1093）的討論[566]和朱子和湖南諸公辨論，熱烈不過。鎔本體、倫理、心理于一爐。不特在學術史上爲一盛事，而亦于思想進程爲一大躍進[567]。

中和問題，即是未發已發問題，亦即是性情和性命問題。中庸把天命和性聯繫起來，說「天命之謂性」(1)，是前所未有。詩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568]，隱示性善，而這裏直說率循本性就是道，當然性非本善不可。顯然超出論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和「性相近」[569]之外，又和大學言心不言性不同。中庸又說出性和教的關係。大學言教，已從心理和知識出發，比論語進步。中庸從人性出

發，更高一層。

所謂天命，客觀上就是天道。論語雖說君子要畏天命[570]，但又說天道不可得而聞。中庸不特說天道可以聞，而且和人道合說。這道是「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12)。卽是說，天道人道貫串爲一。這貫串在乎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1)。

在人方面，「道不遠人」(3)。「忠恕違道不遠」(13)。忠恕就是中庸。論語說孔子之道「一以貫之」，亦卽「忠恕而已矣」[571]。換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72]。中庸引之而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13)。等于大學絜矩之道和論語爲仁之方。忠恕是爲仁兩方面。所以中庸說，「修身以道，修道以仁」(20)。

由仁道而天道，其關鍵在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20)。這裏「誠」字的意義是眞實，是實有。這是新出的，爲論語所無。在天方面，「誠者，自成也」(25)。朱子解說，「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者，是他實有」[573]。中庸說，「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25)。又說，「故至誠無息。……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26)。在人方面，誠是修身立道的準則。要反身而誠才能「順乎親」，「信乎朋友」(20)。誠的方法，首先是明乎善。「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身矣」(20)。這是過于大學的誠意而相當于大學的明明德。明善的步驟爲「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20)，和大學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根本相同。誠于是可以率性。率性于是可以修道。「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21)。人能達到這個地步，就可以「擇善而固執之」(20)，「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20)，完全實現人性的本質。所以說「唯天下之至誠惟能盡其性」(22)。

誠不特成己，也是成物。「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25)。「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23)。誠之所以貫澈人物，正是如此。統而言之，誠、明、善皆是性的各方面。由盡其性到盡物之性，是「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23)。因誠而化，是因果關係。從這

關係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如神」(24)。說來很像神怪，但因果必然。朱子說，「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于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574]。這是「可以考諸三王而不繆」的(29)。因爲誠是一切的德性，也是一切的活動原則。從此準則，人們不特可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22)。結果是天人合一。

明白這誠明的道理，我們不難了解生知、學知、困知、和勉行、利行、安行的分別(20)。生知、安行並沒有什麼神秘，而不外是人性的純正，不外是至誠，盡性。也不難解釋中庸所講的鬼神。「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16)。因爲人物一體，原則相同。人物可以相通。

「夫微之顯」又顯出中庸的另一特性，卽是相對或反對的融合。「莫現乎隱，莫顯乎微」(1)。中庸舉出許多相對或反對的觀念，如尊德性和道問學(27)，仁義(20)，語大語小(12)，和上面的仁知，內外，忠恕，誠明，己物，天人，都看作「道並行而不悖」(30)，養成儒家整個歷史上的異途同歸的中庸之道。

至於中庸和大學比較，學者常說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又說大學專重人道，中庸則兼言天道。大學是教育，中庸近宗教。如此之類，大概而言，未嘗不可。然中庸的戒愼、恐懼、和愼獨和大學的定、靜、止，自慊相似。中庸的體物不遺可以和大學的格物相通。上面經已指出，大學明明德根本上是中庸的明善，中庸的學、問、思、辨、行，有類大學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朱子說，「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卽誠意立心修身之效也」[575]。總之，己立立人，同是大學中庸的共同目的。

孟子和中庸的相同點，則比大學爲多。孟子的「居下位而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于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下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576]，和中庸「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20)，和「唯天下至誠唯能化」(23)，幾乎完全相同。孟子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577]，等于中庸的自誠。孟子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578]，亦即中庸的明善、自誠、能化、而神。孟子有如中庸，也說性命[579]。當然孟子的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修身、立命[580]，比中庸較爲精明。中庸(14)和孟子都主張「俟命」。孟子說，「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581]。又說，「順受其正」[582]。孟子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583]，不外是中庸的至誠能化，與天地參。很多學者因爲中庸的誠，比較孟子詳細，于是說中庸必是孟子的發揮，後于孟子。可是孟子論性顯然比中庸較爲詳明。中庸只說知天(20)，孟子則進而說事天[584]。中庸只說智、仁、勇(20)，孟子則進而說仁、義、禮、智[585]。這些方面，則孟子又較中庸爲進步。又有許多學者說中庸屬于孟子一派，大學則屬于荀子一派。從大處言未嘗無理。至于說大學近道家，中庸近佛家，則不免胡說。孟子和荀子均言性，這是中庸。孟子和荀子均言修、齊、治、平，這是大學。

五、五行問題

和中庸有間接的關係的是陰陽五行的問題。荀子非十二子說，「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倡之，孟軻和之」[586]，引起後來許多爭辯。中庸和孟子都沒有「五行」名詞。于是楊倞(壯年818)的荀子注把「五常」解作「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章太炎(1868-1936)駁他，以爲五行應從金木水火土舊義。他指出鄭玄注中庸「天命之謂性」說，「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又指出禮記以水、火、土比父、母、和子[587]。他于是結論五行舊義是子思的遺說[588]。譚介甫不肯接受章氏之說，因爲「有子思孟軻的五行，又有子思後學的五行，又有騶衍的五行，又有漢儒的五行」。思孟的五行，即是後世的五倫[589]。他舉出中庸「天下之達道五」的五倫，指是五行。又引呂氏春秋曾子所說的敬、孝、忠、篤、勇的「五行」[590]做旁證。然而譚氏强說達道五是五行，其武斷並不減于楊倞。由「五行」的名詞和觀念而言，詩經，易經，和春秋都沒有。但是尚書洪範篇則說，「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591]。雖然洪範時代大有問題。不少學者以

爲是戰國之作。然而左傳講「五行……五味……五色」，說是「民之行也」[592]。可知五行是五種行動。國語的魯語「地之五行」，注說金、木、水、火、土[593]，和鄭語「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物」[594]相照。從此可知五行有兩義，一是五德，一是五物。在春秋時期已是如此。兩者相配，雖然是後來的事，但論語已經有些痕跡，如「仁者樂山，知者樂水」[595]便是。所謂五行，不一定是鄒衍的怪誕和五行相勝相克等說。馬融注論語「鑽燧改火」[596]，說一年改取五種火。皇侃的疏變本加厲，以爲「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表示論語已有五行相克之說。這種附會是求之過急的[597]。

陰陽之說，雖然論語，中庸，孟子沒有，但兩德相輔，可以作陰陽看，如論語的仁智，仁義，中庸的中和，已物，尊德性道問學，內外，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和大學的明德親民均是。這沒有神秘。假如從這個角度來看陰陽五行，則史記把鄒衍放在孟子荀卿列傳裏，並不爲奇，何況太史公指出鄒衍「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呢[598]？鹽鐵論說，「鄒子以儒術干世主」[599]，不是假話。況且史記有孔子說陰陽的話[600]，漢書藝文志又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601]。可知陰陽是儒家傳統成份之一。

然則何以荀子又評子思、孟子呢？荀子評孟子性善之說，人所共和。非十二子表面上似乎專攻子思孟子的五行。王應麟看到韓詩外傳所引荀子評諸子中只有十子，而沒有子思孟子[602]，便說，「荀子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603]。就是說，荀子本來沒有攻擊子思的。盧文弨(1717–1795)重述王應麟之說，附註于非十二子題目之下說，「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並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附益」[604]。王氏盧氏都沒證據。大概韓詩外傳刪略荀子之文，也許和王盧一樣，不肯承認荀子批評子思孟子罷了。同樣的顧頡剛以爲荀子不是評子思孟子而是評鄒衍的。因爲孟子是鄒人。鄒衍又說仁義。給人傳訛，以他的五行爲孟子的五行。又以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故又以爲是子思的五行。實際上是鄒衍的[605]。顧氏的曲析造作，加倍于王應麟，用心太苦了。徐復觀則以鄒衍說仁義，借子思孟子以自重。荀子聽信流言，以爲鄒衍的五行是子思孟子所說，是以評之[606]。這樣假設太多，結論也不外是一個假設而已。我以爲荀子無疑地評，但所評不是五行本身，而是「略

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棄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飾案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所以韓詩外傳評「此十子者皆……不法先王，案往舊造說」[607]荀子除此處用「五行」以外，還有一次，卽「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608]。這裏的五行是「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荀子並不批評五行而反而贊美。可知荀子並不攻擊五行。他說陰陽好幾次，如「相陰陽」[609]，「陰陽大化」[610]等等。他並沒有攻擊陰陽。他攻孟子集中于性惡篇以「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而孟子反而道性善[611]。當然和其他諸子一樣，都是「造說」。

陰陽五行是早期儒家傳統之一部。到鄒衍時，雖大變化，然在荀子書中仍保留不少。禮記强調五行，說「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612]。又引荀子五行足以正身安國的話[613]。無疑地陰陽五行是早期儒家學說之一種。吾人不能因爲鄒衍等怪誕，便害怕了，要說五行不屬儒家，子思孟子沒有五行，荀子沒有批評子思孟子，因而埋沒早期儒家陰陽五行的成份。

六、弟子再傳弟子——第四代

相傳子思的弟子據漢書有魯繆公[614]，據孔叢子有子上，縣子，孟子車，申詳，羊客，曾申，和衞公子交[615]。他們只是問過子思，本人並無學說可言。且孔叢子是僞書。沒論漢書和孔叢子的記名可信不可信，他們已經到了孟子的年代，不是初期儒家了。

七、儒墨的關係

談初期儒家，不能不談初期墨家，因爲儒墨兩家的關係，素來是很密的。墨子本書便說墨子「稱于孔子」[616]。淮南子更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617]。這或者是推測之詞，然儒墨相同之處，確實不少。所以呂氏春秋說，「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于天下」[618]。韓非子也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619]。又說，「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620]。淮南子又說，「孔丘墨翟修先王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621]。又說，「孔丘墨翟之弟子皆以仁義

之術教導于世」[622]。這幾本書所描寫的多是戰國末年的情形，但也反映早期儒家的境況。墨子之學于儒者是無可疑，所以據太史公說，「墨者亦尚堯舜道」[623]。儒墨相同，除堯舜仁義六藝之外，大戴禮記載有兼愛之說[624]。陳澧以爲是墨氏之說所竄入，所以孔子三朝記和小戴禮記都不收取[625]。但攻擊道佛而衞道的韓愈却說，「孔子……不上同哉？……不兼愛哉？……不上賢哉？……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626]。當然韓愈過言，所以王安石（1072–1086）譏他，「孔墨必相同，自古寧有此」[627]？程頤也說，「甚不可也」[628]。理學家不承認儒墨有相同處，自然是他們受孟子距楊墨的影響。但實際上儒墨確有不能相容之處。呂氏春秋指明「孔子貴仁，墨子貴兼」[629]。尸子也指出「墨子貴兼，孔子貴公」[630]。根據韓非子，儒墨「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墨者……服喪三月。……儒者服喪三年」[631]。因此雖然「受孔子之術」[632]，老早便反對儒家，說「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又厚喪久葬。……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又以命爲有」[633]。他反對儒者「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傷本棄事而安怠傲。貪于飲食，惰于作務。……必服古言。……循而不作」[634]。反對儒者「好樂……立命……宗喪……機服。……孔某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彖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635]。又反對三年之喪。「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深害生事」[636]。

以上墨子所攻擊自然是初期儒家。他在孔子之後，所以不是攻擊孔子而是攻擊孔子的後繼。他的勢力，是與儒家爭衡。呂氏春秋說，「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637]，又說「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638]。他們的弟子更顯烈而競爭更利害。呂氏春秋說，「孔墨之後學顯榮于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639]。又說，「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640]。又說，「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641]。莊子也說，「儒墨皆起」[642]。到了韓子時候成爲「世之顯學」[643]。他們互相對峙，照莊子說，「儒墨畢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644]。于是「有儒墨之是非，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645]。淮南子也說，

「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646]。又說，「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647]。所謂孔子墨子，是追憶之詞，而所形容的是儒家第二、三、四代的狀況。據淮南子的記載，墨徒所反對的「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易），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648]。第三、四代儒家這方面的發展，醉心外觀，遭墨家的熱烈攻擊。恐怕孔子如果復生，也許以杖叩其脛。

八、荀韓的批評

儒家第三四代的情況，又可于荀子和韓非的評論見之。荀子批評「六說……十二子」[649]，是它囂和魏牟，陳仲和史鰌，墨翟和宋鈃，愼到和田駢，惠施和鄧析，與子思和孟軻。其中只是子思和孟子是儒家。目的是抨擊「假今之世」[650]的墨家和法家。他要推重儒家，非批評子思孟子不可，因爲照前所述，子思孟子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說，以爲是眞先君子之言。換言之，子思孟子並非孔子之眞傳。同時又有「弟佗(頹唐)其冠，衶禫(沖澹)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淪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651]。他所鼓吹的是「大儒」，卽是能「善調一天下」[652]的人，「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千舉萬變，其道一也」[653]。這大儒的典型是仲尼子弓[654]，亦卽是「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655]的仲尼子弓。他要仁人「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業畢，聖王之跡著矣」[656]。他攻擊子思孟子並非攻擊儒家，反而要回復儒家本義。

至于爲什麼要專意提出仲尼子弓呢？上面討論四科指出孟子除了仲弓，而荀子則特別加入，眞是奇怪。子弓就是冉雍，字仲弓。用「子弓」而不用「仲弓」，大概是要避免重複「仲」字。但孔門之中冉雍並非出色。若說傳授，不提曾子子夏而提仲弓，眞不可解。仲弓沒有顯赫的事功，也沒有特殊的言論。勉强可以說他問仁于孔子，孔子答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57]，這是忠恕，亦卽一貫之道。那麼可以說和曾子一樣，得到孔子的中心思想。這種解釋，不免近于推度。我想荀子把孔子和子弓並提，

是因爲他們是「聖人之不得勢」。既然仲弓可使南面[658]，如果得勢，便能行其道了。但荀子說世俗錯誤，以爲子思孟子所傳授的是仲尼子游的教訓。子游和子夏同列文學之科。他做過武城宰，以禮樂教人。禮記檀弓上下不少他講禮的記載[659]。我們不必相信禮記禮運篇大同一段是原于子游，但子游是早期儒家禮的傳統的一個大臺柱，並不是不可能。郝懿行(1757–1825)因爲荀子下文說「子游氏之賤儒」，以爲這「子游」必是「子弓」之誤。並且荀子所謂子張，子夏，子游之賤儒，不是指三位弟子而是指弟子的後輩。所以他說，「言在三子之門爲可賤，非賤三子也」[660]。這一點實顯而易見，因爲子張之賤儒「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661]，和子張問仁，問士，問善人，問政的嚴重不同。子夏之賤儒靜默自得，和子夏爲莒父宰爲魏文侯師也不類。子游之賤儒無恥貪食則和子游愼禮相差更遠。荀子批評賤儒，並未說及他們的學說，反而完全批評他們的作風。他看到當時儒家的行誼低落，大有違反孔門弟子的精神。隨便舉三個著名的弟子，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以批評三種作風。並非靜默的出自子夏，形式的出自子張，無恥的出自子游的。這是行文之便。我們不應太過固執。同樣，我們也不必問爲什麼荀子不提曾子了。我以爲非十二子的重要點是(一)儒家早有傳授，「世俗……受而傳之」。(二)這傳授集中于子思孟子。(三)這傳統是「法先王」，「見聞博雜」，「案往舊說」。即是守舊，但又包括五行。(四)儒者必是很多。(五)除子思孟子學說以外，儒家的表現在于行誼，而行誼是可鄙的，都是俗行。這是荀子所見戰國時期儒家的情形。然其來有漸。初期儒家的情形，必有這種趨向。荀子未必是完全客觀，但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比較荀子的批評，韓非的記錄所給我們消息更少。他分儒爲八派，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662]。由子張第二代說至孟子第四代，歷時二百年。下面只漆雕氏有點形容，說他「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乎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663]。其餘只是泛言儒者。因此八派的言論和歷史上的活動，我們無從捉摸。著名的弟子曾子，子夏，子游，仲弓，有若等等言論和事功完全不提。郭沫若以爲「韓非承認法家出于子夏，也就是自己的宗師，故把他從儒家中剔除了」[664]。這是胡說。論語中子夏說孝，說禮，說有命在天，後來傳經，固然和法家

風馬牛不相及。法家怎能出于子夏呢？胡適說，「最可怪的是曾子……別成學派」[665]。我們相信孔子死後弟子分道揚鑣則有之，設立學派則未必然。而且在此八派之中，孔子的直傳弟子，卽是第二代，佔少數。子張必然指孔子弟子顓孫師，子思指孔子的孫兒而不是也字子思的原憲，孟子指孟軻，均無可疑。但顏氏是否顏回，便發生大問題。皮錫瑞（1854–1901）指出，「孔門弟子顏氏有八，未必卽是子淵」[666]。孔子弟子之中有三個漆雕氏[667]。只漆雕開有點事跡。我們可以假設就是他。但是論語載孔子要他出仕，他說沒有自信[668]。和韓非形容他勇敢不同。墨子非儒篇更說「漆雕形殘」[669]，以表示其異常大勇。因爲孟子以「不膚撓，不目逃」描寫北宮黝之勇[670]，學者便以爲他是漆雕氏之儒[671]。這只是疑似，毫無實證。況且孟子說北宮黝似子夏，沒說他似漆雕子[672]。我們最多可能說不敢自信的漆雕開竟然一兩代後生出好勇的儒。然而這不過是一個臆說。王先謙說上面的「漆雕開之儒」和好勇的漆雕氏是兩個人[673]，也是臆說。仲良又作仲梁。漢書古今人表有仲梁，與齊襄王（283–264 B. C.）同時[674]。禮記載他和曾子論葬禮[675]。詩經「作于楚宮」，毛傳引仲梁子說，「初立楚宮也」[676]。假使仲良眞是仲梁，消息也不外如此。梁啓超疑他是孟子所記北學于中國的陳良[677]，則完全虛測[678]。如果他眞是陳良，則他生在襄王時，孟子已死，他們怎能相見呢？孫氏有人以爲是公孫尼子，又有人以爲是荀子，都是猜度的話，毫無根據。漢書名表有樂正子春[679]。傳說是曾子弟子。孟子弟子樂正子[680]，梁啓超「疑卽傳曾子學者」[681]，也是空話。總之，「儒分爲八」的話，我們只可說儒家門徒衆多，分途並進，傳統不一。絕不像宋儒所說由孔子直傳子思孟子。可惜墨子，荀子，韓非子供給材料太少。韓非並未分別敍述門弟子的思想或描寫他們的個別作風。只是籠統地說他們「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682]。似乎上半是描寫儒家素來的性格和相當成就，下半寫當時的作風。荀子韓非子合觀，可以互相發明。荀子重性格，韓子重事業。然而兩面都尙古，重文敬禮，聚徒設教，游說諸侯，說先王之道。可見第三四代，仍然不變第一代的風格。

九、結　　論

在儒家第二、三、四代一百五十年當中，孔門非常活動，成就也高。人數比任何學派爲多，版圖也比他們爲大，幾乎分佈全國。他們分兩途並進，一是從政，一是教學。這是依據孔子的模範，豎立儒家政學兩途的傳統。直到廿世紀也是如此。

關于從政方面，經典所載他們的政績和行動，總是注重德化，目的在修身治國，修己安人。戰爭的記錄很少。即功利主義的作風也不多見。這也是從孔子政治理想而開發，直接傳授到孟子以至完成儒家人文的、德治的政治主義。實際的政治措施，最注重的是禮節。這是社會在組織中很自然的。但這和漢代的制禮不同。漢朝的目的大都是尊重君權，統制社會。初期儒家的重禮，尤其是喪禮，則純然從孝的道德方面出發。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其揆一也 。可惜他們成功太快而且太大 ，不免淪落爲職業化，官僚化，趨向小節和向外，以至成爲俗儒，賤儒。我們敢說，儒家的優良政治傳統，是成立于這個時期，而腐化的成份，也先有成例。

比較更爲輝煌的是他們教學的成就。他們分途並進，並沒有一線的傳授。傳經固無其事，分做四科也無痕跡。消極方面，初期儒家沒有一個能和墨子、楊朱比並的思想家，也沒有像墨子書那樣連篇的典籍 。 如果我們不承認大學 、 中庸是這時期的作品，這時期很像是一個哲學的黑暗時代。可是就算是從大學、中庸以外來看他們的思想，也可以找出非常重大的意義。因爲他們的政治思想，總是擇善、重德、親民。倫理方面，總是集中于仁的觀念，由這裏發出做君子，教孝，教禮等等儒家基本教條。這也是遵守孔子的教訓。于是儒家思想一往前進。雖然後來荀子含有道家和法家的趨向，結果仍是孟子的儒道成了眞傳。如果初期儒家變了性格，後來儒家的歷史必然兩樣。

初期儒家也略談詩，鬼神，生死，陰陽，報應，天圓，大勇，和性之善惡。但他們對商業，科學，形上學，知識論總乏興趣。沒有把孔子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和尊重農圃[688]伸展做科學 ， 連大學的格物不久便成了孟子的格心 。 正名思想也不成爲知識論。他們最着意的是孝道和葬禮，尤其是三年之喪 。 在這社會組織 ， 制作禮儀進程中，初期儒家可能從法制方面着手，把儒家變成法家。也可能從神權方面發展，把儒

家變成宗教。但他們謹守孔子的教訓，不肯走出人文主義道德主義的路線。中國文化的優點和弱點，早在這個時期已經形成了。

因爲初期儒家要走道德人文的路線，他們固然不談兵，連正名也不談，讓兵家名家佔了上席。但沒論大學中庸是否這時期的作品，他們的主要的思想是這時期的。這思想是這時期儒家的結晶。大學的三綱八目，成爲以後儒學的思想藍本，固不待言。中庸的言性，言道，和天命，出于孔子罕言命和性與天道不得而聞之外，加上中和思想，以至天人合一。從整個初期儒家而言，墨家同是顯學，實際上是一個反動，而漢、唐、宋、明、儒學之遠流，也是源泉有自的。

附　　注

1.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考辨26，孔鯉顏回卒年考，49。
2. 許同莘　孔子年譜（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1955），480。
3. 崔述　洙泗考信餘錄（崔東壁遺書，1924），2，宰我條，15b。
4.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27，宰我死齊考，50—53。
5. 錢穆　論語要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150。
6. 崔述　洙泗考信餘錄，3，孔門弟子通考，19b。
7.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39，子夏居西河在東方河濟之間不在西土龍門汾州辨，117—118。
8. 錢穆　同上，114—115。
9. 呂氏春秋（四部備要本，1927），4，尊師，5b。
10. 據崔述　洙泗考信餘錄，3，孔門弟子通考，19a。
11. 同上。
12. 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本，1930）38，七十二弟子解，9/5a，7a。
13. 韓詩外傳（四部叢刊本，1929），1，頁 1a。
14. 孟子，4，離婁下，31。
15. 參看下第三節，弟子的弟子。
16. 論語，5，公冶長，20；崔述，洙泗考信餘錄，3，孔門弟子通考，20a。
17. 論語，7，述而，3。
18.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29，孔子弟子通考，74。
19. 崔述　洙泗考信錄餘，3，孔門弟子通考，19b。
20. 論語，5，公冶長，1。
21. 同上，11，先進，5。
22. 班固（32—92）漢書（百衲本，1967），20，古今人表，28b。
23. 崔述　洙泗考信錄餘，2，南容條，22b。
24. 論語，11，先進，25。
25. 閻若璩　四書釋地又續——（阮元，1764—1849，編，皇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1961）22。曾晳倚門而歌條，34 a-b。
26. 史記（百衲本，1967），67，仲尼弟子列傳，索隱引古本家語。

27. 同上，67/17b。
28. 論語，11，先進，24。
29. 參看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29，孔子弟子通考，61。
30. 閻若璩 四書釋地三續（皇清經解，23），漆雕開條，36b。
31.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29，孔子弟子通考，75。
32. 論語，14，憲問，38。
33. 史記，67，仲尼弟子列傳，18b。史記正義引譙周的古史考。
34. 崔述 洙泗考信錄餘，3，孔門弟子通考，20a。
35.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29，孔子弟子通考，72。
36. 史記，67，仲尼弟子列傳，19b。
37. 孟子，3，滕文公上，4。
38. 金鶚 求古錄，9（續台州叢書甲集，同治丁卯，1867），禮說，孔子弟子考，8a-b。指論語，5，公冶長，25。
39.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29，孔子弟子通考，73—74。
40. 梁玉繩 史記志疑，28。下同。梁氏的材料經陳槃先生指示。特此致謝。
41. 史記，67，仲尼弟子列傳，21b。
42. 孔子家語，38，七十二弟子解，9/5a-b。
43. 史記，47，孔子世家，11a。
44. 崔述 洙泗考信錄餘，3，孔門弟子通考，17b。
45. 孔子家語，38，七十二弟子解，9/5a。
46. 史記，47，孔子世家，14a。
47. 孔子家語，38，七十二弟子解，9/5a。
48. 論語，5，公冶長，10。
49. 史記，67，仲尼弟子列傳，21b。關于文翁圖可參看本節第二目弟子的人數內七十二子的討論。
50. 張文虎 史記札記，5/7a。這材料由陳槃先生指示，又謝。
51. 孔子家語，38，七十二弟子解，9/7a。
52. 論語，9，子罕，7。
53. 史記，47，孔子世家，26b。
54. 漢書，20，古今人表，29a。
55. 王念孫 讀書雜志，4，漢書第三，琴牢條。
56. 論語，16，季氏，13。
57. 漢書，20，古今人表，32b，33b。
58. 蔡仁厚 孔門弟子志行考述（臺北，商務印書館，1969），189。
59. 馬驌 繹史（臺北，廣文書局，1969），95/24a。
60. 朱彝尊，曝書亭全集（四部備要本，1966），5 孔子弟子考，1a—16b。
61. 梁玉繩 史記志疑（叢書集成初編本，1939），28，仲尼弟子列傳，1137。
62. 論語，3，八佾，4。
63. 史記，67，仲尼弟子列傳，21b。
64. 論語，2，爲政，6。
65. 史記，47，孔子世家，25a。
66. 焦循 孟子正義，5，萬章上，8。
67. 論語，2，爲政，5。

68. 史記，47，孔子世家，2a—3a。
69. 崔述 洙泗考信錄，1，初仕條，12a。
70. 毛奇齡 四書賸言補（西河合集，乾隆庚寅，1770本），1/17a。
71. 史記，67，仲尼弟子列傳，21b。
72. 崔述 洙泗考信錄餘，3，孔門弟子通考，17b。
73. 孟子，2，公孫丑上，2。
74. 韓非子（四部叢刊本，1929），49，五蠹，19/3a。
75. 呂氏春秋（四部備要本，1927），14，遇合，16b。
76. 劉安（179—122B.C.），淮南子（四部備要本，1927），20，泰族訓，10b。
77. 同上，21，要略，6b。
78. 同上，9，主術訓，17a。
79. 戴德（壯年 60 B.C.），大戴禮記（四部叢刊本，1929），60，衞將軍文子，6/3a。
80. 孔子家語，12，弟子行，3/5a。
81. 史記，67，仲尼弟子列傳贊，121，仔林列傳，1b；127，貨殖列傳，2a。
82. 漢書，88，儒林列傳序語，2a。
83. 同上，30，藝文志序。
84. 同上，36，楚元王傳，10a。
85. 同上，30，藝文志公孫尼子注，13b。
86. 孟子，3，滕文公上，3。
87. 史記，47，孔子世家，25a。
88. 范曄（398—445），後漢書（百衲本，1967），90下，蔡邕傳，4a。
89. 水經注（四部備要本，1966），8/21b。
90 魏收（506—572），魏書（百衲本，1967），66，李平傳，9b。
91. 顏之推（531—591），顏氏家訓（四部備要本，1966），5，誡兵篇，7a。
92. 史記，28，封禪書，5a。
93. 莊子（四部叢刊本，南華眞經，1929），14，天運，5/49b。
94. 劉師培，古書疑義舉例補（長沙，鼎文書社，1924），1b。
95. 史記，67，仲尼弟子列傳，1a。
96. 漢書，28下，地理志，31b。
97. 史記，47，孔子世家，25a。
98. 淮南子，20，泰族訓，10b。
99.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29，孔子弟子通考，56。
100. 孔子家語，12，弟子行，3/5a。
101. 崔述 洙泗考信錄，1，初仕，15b。
102. 史記，67，仲尼弟子列傳，4b。
103. 同上，67/24a。
104. 史記，47，孔子世家，4a，7a。
105. 史記，121，儒林列傳，1a。
106. 呂氏春秋，14，遇合，16a。
107. 呂氏春秋，2，當染，10a。
108. 韓非子，50，顯學，19/7b。
109. 墨子（四部叢刊本，1929），50，公輸，13/14a。

110. 淮南子，20，要略，10b。
111. 墨子本書有禽滑釐，高石子，高何，縣子碩，公尚過，耕柱子，魏越，隋巢子，管黔敖，高孫子，治徒娛，跌鼻，曹公子，勝綽，彭輕，孟山，弘唐子，胡非子。韓非子顯學有，相里，相夫氏，鄧陵氏。呂氏春秋有孟勝，田襄子，腹䵍。據謝湖，墨子學說研究（香港，上海印書館，1967）121—122。可參考康有爲（1858—1927）孔子改制考（上海，中華書局，1968），115—125。
112. 史記，46，田叔仲完世家，13b－14a。
113. 桓寬（前一世紀），鹽鐵論（上海，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1954），11/12。人數據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75，穆下通考，217—218。
114. 參看後漢書，109上，儒林傳，曹曾傳（歐陽歙傳內），牟長傳，宋登傳，和109下，魏應傳，樓望傳，和蔡玄傳。
115. 史記，47，孔子世家，24a。
116. 同上，75，孟嘗君列傳，8a。
117. 同上，76，平原君虞卿列傳，5a。
118. 同上，78，春申君列傳，7a。
119. 同上，126，滑稽列傳，8a。
120. 劉師培　古書疑義舉例補，10b—11a。
121. 崔述　洙泗考信錄餘，2，子路條，5b。
122. 錢穆　論語要略，144。
123. 崔述　洙泗考信餘錄，3，孔門弟子通考，20a。
124. 同上，3/19b。
125. 閔損（2），伯牛（3），仲弓（4），冉有（5），宰我（7），子游）（9），子賤（14），（原憲）（15），（公冶長）（16），南宮括（17），（漆雕開）（23），公伯寮（24），（樊遲）（26），有若（27），公西華（28），（巫馬期）（29），顏幸（31），冉孺（32），冉季（36），漆雕哆（39），公首夏（49），（公堅定）（51），顏祖（52），（秦商）（56），申黨（57），顏之僕（58），縣成（60），左人郢（61），秦非（64），鄭國（63），顏噲（66），樂欬（69），叔仲會（71），顏何（72），邦巽（74），孔忠（75），公西赤（77）。有括弧的八人可能是別國的。
126. 子夏（10），（高柴）（22），（公孫龍子）（35），奚容蔵（50），句井疆（54），廉潔（70）。
127. 公晳哀（18），（高柴）（22），（樊遲）（26），梁鱣（30），后處（47），叔乘（67）。
128. 顏回（1），閔子（2），伯牛（3），宰我（7），子游（9），曾子（12），澹台滅明（13），子賤（14），公冶長（16），南宮括（17），曾蔵（19），顏無繇（20），高柴（21），樊遲（26），有若（27），公西華（28），顏幸（31），冉孺（32），顏高（40），秦商（56），叔仲會（71），孔忠（75）。
129. 子貢（8），子夏（10），公孫龍（35），琴牢（78）。
130. 子張（11），巫馬施（29），公良孺（46），陳亢（79）。
131. 崔述　洙泗考信餘錄，3，孔子弟子通考，19a。
132. 同上。
133. 論語，1，學而，1。
134. 同上，4，里仁，19。
135. 中庸，6。
136. 孟子，3，滕文公上，4。
137. 論語，11，先進，2。
138. 同上，6，雍也，9。
139. 同上，2。
140. 同上，5。

141. 同上，11，先進，8。
142. 同上，4。
143. 同上，5，公冶長，3。
144. 同上，2，14，憲問，6。
145. 同上，3，八佾，8。
146. 同上，5，公冶長，1。
147. 同上，11，先進，25。
148. 同上，6，雍也，4。
149. 同上，1。
150. 同上，8。
151. 孟子，3，滕文公上，2。
152. 論語，5，公冶長，9。
153. 同上，11，先進，16。
154. 同上，3，八佾，2。
155. 同上，11，先進，3。
156. 同上，15。
157. 呂氏春秋，4，尊師，5b。
158.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29，孔子弟子通考，77。
159. 論語，9，子罕，27。
160. 史記，124，游俠列傳，1a；129，貨殖列傳，5a。
161. 說苑（四部叢刊本，1929），17，雜言，15a。
162. 史記，67，仲尼弟子列傳，5a。
163.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29，孔子弟子通考，76—77。
164. 孔子家語，8，致思，2/8a；又見說苑，3，建本，3b。
165. 崔述　洙泗考信錄餘，2，子路條，5a。
166. 韓詩外傳，7/6a。
167. 史記，121，儒林列傳，1a。
168. 漢書，88，儒林列傳，1a。
169. 史記，129，貨殖列傳，5a。
170. 同上，67，仲尼弟子列傳，12b。
171. 同上。
172. 同上，129，貨殖列傳，5a。
173. 同上，67，仲尼弟子列傳，15a。
174.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29，孔子弟子通考，70。
175. 同上註 167。
176. 荀子（四部叢刊本，1929），6，非十二子，3/15b—21b。
177. 韓非子，50，顯學，19/7b。
178. 朱彝尊　經義考（四部備要本，1966），282，承師條，3a-b。
179. 論語，19，子張，12。
180. 史記，44，魏世家，3b。
181. 戴聖（壯年 50 B.C.），禮記，19，樂記第二十四，二十五節。
182. 漢書，30，藝文志13b。

183. 呂氏春秋，2，當染，10a；4，尊師，5b。
184. 史記，121，儒林列傳，1a。
185. 崔述，洙泗考信餘錄，3，附錄十有二人，10b。
186. 孟子，4，離婁下，31。
187. 同上。
188. 大戴禮記，52，曾子大孝，4/9b。
189. 同上，4/11a。
190. 同上，53，曾子事父母，4/12a，5，曾子天圓，7a。
191. 禮記，20，雜記下第二十九節；3，檀弓上，第十四節鄭注。
192. 說苑，20，反質，17b。
193. 呂氏春秋，2，當染，10a。
194. 朱彝尊 曝書亭全集，42，孔子門人考，57/3a。
195. 論語，19，子張，19，包咸注。
196. 孟子，2，公孫丑上，2，趙岐注。
197. 同上，3，滕文公上，1，趙岐注。
198. 同上，5，萬章上，1，趙岐注。
199. 同上，2，公孫丑上，1，趙岐注。
200. 同上註 186。參考下面第三節弟子的弟子——第三代。
201. 顏子，曾點，曾子，有子，子夏，子路，子貢，子游，子張，宰我，仲弓，樊遲，司馬牛，冉求，公西華，林放，和南宮适。
202. 顏子(12/1)，子貢(6/28，15/9)，子張(17/6)，宰我(6/24)，仲弓(12/2)，樊遲 (6/20，12/22)，司馬牛 (12/3)。
203. 孟子，子路—2上/1，8；3下/7，5上/8。曾子—2上/2，2下2，3上/4，3下/7，4上/19，4下/31，7下/36。
204. 宰我，2上/2。子貢，2上/2，3上/4。冉牛，2上/2。閔子，2上/8。顏子，2上/2，4下/29。子夏，2上/2，3上/4。子游，2上/2，子張，2上/2，3上/4。有若，2上/2，3上/4。曾晳，4上/19，7下/36，37。牧皮，7下/37。琴張，7下/37。
205. 論語，6，泰伯，6，23，15，衞靈公，33。
206. 孔子家語，3，王言解，1/7b—8b，10b。
207. 同上，13，賢君，3/14a；18，顏回，5/2a，4b，5a。
208. 同上，21，入宿，5/13a；22，困誓，5/21a。
209. 同上，19，子路初見，5/9a。
210. 同上，13，賢君，3/14a；14，辯政，3/17b；25，執轡，6/4a；43，曲禮子夏問，10/10b。
211. 同上，21，入官，5/14a。
212. 同上，30，五刑解，7/6b，8b；31，刑政，7/10a。
213. 同上，6，問禮，1/20b；27，論禮，6/14b，16b；32，禮運，7/13b；42，曲禮子貢問，10/5b，6b，8a，9a；43，曲禮子夏問10/11a，12a；44，曲禮公西赤問，10/24a。
214. 同上，27，論禮，6/17b。
215. 同上，8，致思，2/10b。
216. 同上，15，六本，4/20a。
217. 同上，4/5a。
218. 同上，19，子路初見，5/5b。
219. 同上，8，致思，2/4b。

220. 同上，10，好生，2/15a。
221. 同上，15，六本，4/3a。
222. 同上，20，在厄，5/5b。
223. 同上，43，曲禮子夏問，44，曲禮公西赤問，10/11a—24a。
224. 同上，43，曲禮子夏問，10/11b，13a。
225. 同上，19，子路初見，5/9a。
226. 論語，11，先進，11。
227. 同上，7，述而，20。
228. 大戴禮記，50，曾子本孝，4/7b—8a。
229. 同上，51，曾子立孝，4/8b。
230. 同上，4/9b。
231. 同上，52，曾子大孝，4/9b—11a。
232. 同上，53，曾子事父母，4/12a。漢書，30，藝文志，13a，有曾子十八篇，今存十篇，都收入大戴禮記。除已經舉出五篇外，又有大戴禮記 54—56，曾子制言上中下，57，曾子疾病，和58，曾子天圓。叢書集成有曾子十篇，即是這十篇。
233. 紀昀（1724—180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646。
234. 孝經，1。
235. 同上，5。
236. 同上，7。
237. 同上，16。
238. 孟子，4，離婁上，19。
239. 孔子家語，38，七十二弟子解，2b。
240. 王充，論衡（四部備要本，1927），19，感虛，15b。
241. 孔子家語，15，六本，4/5b。又說苑，3，建本，5a。
242. 尸子（四部備要本，1933），卷下，8b。
243. 大戴禮記，54—56，曾子制言上、中、下。
244. 同上，58，曾子天圓，5/8a。
245. 同上，5/8b。
246. 同上，5/9a-b。
247. 禮記，3—4，檀弓，上、下。
248. 同上，21，雜記下。
249. 同上，24，祭義，第三十四，三十五節。
250. 同上，29，仲尼閒居，第一至四節。
251. 同上，第二節。
252. 同上，第五節。
253. 論語，1，學而，15。
254. 同上，8，泰伯，3。
255. 禮記，3，檀弓上，第十八節。
256. 馬國翰輯，儒家佚書輯本五十五種（臺北，世界書局，1958），漆雕子一卷，宓子一卷。
257. 韓非子，34，外儲說上，13/3a。
258. 史記，47，孔子世家，28a。
259. 同上，47/14b。

260. 同上，67，仲尼弟子列傳，17b。
261. 同上，67/13b。
262. 同上，67/18a。
263.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30，孔門傳經辨，77—81。
264. 同上，71。
265. 陶潛（藝苑捃華本，光緒壬辰，1868），聖賢錄，25b，八儒條。陶潛的話是附會韓非子50，顯學，19/7b儒分爲顏氏，孟氏等八家，和禮記經解第一節「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2807）說是「晚出僞書」。
266. 論語，11，先進，2。
267. 孟子，2，公孫丑上，2。
268. 邢昺的疏和劉寶楠（1791—1855），論語正義。
269. 後漢書，110下，文苑傳內嵇炎傳注，12b。
270. 史記，67，仲尼弟子列傳，1a。
271. 鹽鐵論，21，殊路，24—25。
272. 同上，註269。
273.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四部叢刊本，1919），5，推委臣下論，13a。
274. 韓愈，論語筆解（叢書集成本，1939）。
275. 錢穆，論語新解。
276. 李翺，論語筆解（叢書集成本，1939）。
277. 王弼，論語釋疑。
278. 王樵，四書紹聞編。程樹德（北京，國立華北編譯館，1943），論語集釋，645，引。
279. 朱熹，論語集註（四書章句集注本）。
280. 同上，註277。
281. 歐陽秀（1007—1072），新唐書（百衲本，1967），15，禮樂志，第五，6a。
282. 徐幹，中論（四部叢刊本，1929）9，智行，上卷頁22a。
283. 劉寶楠，論語正義。
284. 程顥和程頤，二程外書（四部備要本，二程全書，1933），6/6a。
285. 根據程樹德，論語集釋，645。
286. 尤侗，艮齋雜說（西堂全集，康熙辛未，1691），7/19a。陳善的捫虱新話（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上集，2/3b，辨論語分章句條却說「孔門中當時有此科目」。
287. 論語，7，述而，24。
288. 同上，17。
289. 同上，6。
290.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39，孔子弟子通考，75—76。
291.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一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1968），88。
292. 劉汝霖，周秦諸子考（北平，文化學社，1929），143。
293. 陸象山，象山全集（四部備要本，1934），35/9b。
294.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0），22。
295. 郭紹虞，論孔門學風只有務外主內兩派書，列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二册，（北平，樸社，1930），253—254）。顧頡剛的答書，255—257。
296. 鄧公玄，孔子以後儒家哲學蛻變之因果，列入黃建中編，中國哲學史論集，第一册，（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1958），64。

297. 劉百閔，孔門五論（臺北，世界書局，1968），13。
298. 武內義雄，中國哲學思想史，汪馥泉譯（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26—35。
299. 同上，32。
300. 平原北堂，支那思想史（京都，人生道場，1942），300。
301. 同上，172。
302. 吉田賢抗，中國思想史（東京，明治書院，1949），51—52。
303. 狩野直喜，中國哲學史（東京，岩波書店，1953），128。
304.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60—362。
305. 劉汝霖，周秦諸子考，150—154。
306. 梁啓超，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臺北，中華書局，1963），27—28，所引莊子是6，大宗師，3/18b；孟子是7，盡心下，37。
307. 論語，2，爲政，23。
308. 同上，3，八佾，26。
309. 同上，泰伯，7。
310. 同上，5，公冶長，15；11，先進，25。
311. 韓愈，韓昌黎全集（四部備要本，1920），11/3b。
312. 李翺，李文公集（四部叢刊本，1929），2/9a-b。
313. 程顥和程頤　二程遺書（四部備要本，二程全書，1933），22上/1a。
314. 朱熹，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70），14，頁399。
315. 朱熹，大學或問（四書大全本，康熙壬午，1702），28a。
316. 朱熹，大學章句（國學基本叢書本，四書章句集注，1935），序。
317. 王守仁（陽明），王文成公全書（四部叢刊本，1929），26/1b-5a。
318. 錢德洪跋，王文成公全書續編，1/10b。
319. 全漢文（臺北，廣文書局，1969），38/26。
320. 王應麟，玉海（四部備要本，1966）34/3b。
321. 據托克托（1328卒），宋史（百衲本，1967），202，藝文志，禮類。三書都佚了。
322. 程顥和程頤，程氏經說（四部備要本，二程全書，1933），5/1a-6b。
323. 孔穎達，禮記正義（上海，世界書局，十三經注疏本，1935），序引。
324. 二程遺書，2上/4a。關于說大學是孔子作的，如許謙（1199—1266），等，參看高明，禮學新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63），102。
325. 朱熹，朱子文集（四部備要本，朱子大全，1930），13，癸未(1163)垂拱奏劄一，1b。
326. 朱熹，大學章句經文注。
327. 朱熹，大學或問，27b。
328. 大戴禮記，1，主言，2b。
329. 張華，博物志（秘書廿八種本，嘉慶辛未，1811），9/2a。
330. 翟灝，四書考異（皇清經解，卷449），11b。
331. 王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70），10，大學沿革論，11a。
332. 鄭曉，大學源流。下註333陳耀文和註337陳槃引。
333. 陳耀文，經典稽疑（四庫全書珍本二集本），大學條，45b，47a-b。
334. 毛奇齡，大學證文（西河合集本）1/6b；朱彝尊，經義考，160/1a。
335. 胡渭，大學翼眞（四庫全書珍本三集本，1972），3/3b。
336. 崔述，洙泗考信錄餘，1，曾子條，16a。

337.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二(香港，新亞研究所，1973)，607。關於大學著者問題，參考陳槃，大學中庸今釋（臺北，正中書局，1944）；4—7；高明，禮學新探，100—107，都很詳盡。
338. 錢穆，中國思想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78。
339. 孔穎達，禮記正義。方東樹（1772—1851）在他的漢學商兌（卷中之上 8b-9a）指出這點。但他據孔疏說錯是鄭玄的注。
340. 朱鶴齡，愚庵小集（北京，燕京大學圖書館，1940），10，與楊令若論大學補傳書，2a。
341. 陳澧，東塾讀書記，9，禮記，13。
342. 陳槃，大學中庸今釋，4。
343. 康有爲，康有海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5，大學句序，19a。
344.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中，東海大學，1963），295。
345. 關于補傳一點，參看戴君仁，梅園論學集（臺北，開明書店，1970），168—170，和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上册（香港，人生出版社，1966），284—291。
346. 程氏經說，5/1a-3a，明道先生改正大學；3a-5b，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347. 這就是他的大學章句。
348. 詳見程元敏，大學改本詳述，孔孟學報，23，（4/1972），135—168；高明，禮學新探，108—120；唐君毅，大學章句辨證及格物致知思想之發展，清華學報，4/2(2/1964)，1—49；林政華，大學中庸之作者與章次考辨，東方雜誌，9/4(10/1975)，41—48。
349.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7，大學古本序，26a。
350. 翟灝，四書考異（皇清經解，卷 449），10b。
351. 王守仁，傳習錄，上（王文成公全書本），1/1a；中，致羅整菴少宰書，59a。
352. 二程經說，5/3a，朱子語類，14/18b；大學或問，14a-b；傳習錄上，1/3a。
353. 朱熹，大學章句，經文注。
354. 同上，序。
355. 禮記正義引。
356. 禮記正義的話。
357. 朱子語類，14，頁397，398，414，415。
358. 同上，14，頁 399。
359. 同上，14，頁 401。
360.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281。
361. 朱子語類，14，頁397。
362. 大學章句。本節所指大學章數，都是用朱子的大學章句。
363. 朱子語類，14，頁 416。
364. 大學問，王文成公全書，26/3a。
365. 論語，19，子張，11。
366. 同上，8，泰伯，1，20。
367. 同上，雍也，27。
368. 朱子語類，14，頁 419。
369. 同上，14，頁 417。
370. 大學問，王文成公全書，26/3b。
371. 論語，6，雍也，28。
372. 詩經，國風，豳風，7，南有台。
373. 論語，6，雍也，25。

374. 同上，14，憲問，45。
375. 傳習錄，上，第一條。
376. 程氏經說，5/3a。
377. 大學章句。
378. 朱子語類，14，頁427。
379. 傳習錄，上，第一條。
380. 尚書，11，康誥。
381. 詩經，大雅，文王之什，1，文王。
382. 同上，商頌，3，玄鳥。
383. 朱子語類，14，頁 428。
384. 同上，14，頁431。
385. 大學章句。
386. 大學問，王文成公全書，26/4a。
387. 傳習錄，上，第四條。
388. 同上，第二條。
389. 同上。
390. 大學章句。
391. 論語，7，陽貨，5。
392. 同上，14，憲問，45。
393. 尚書，1，堯典。
394. 同上，大禹謨。
395. 大學章句。
396. 二程遺書，2上/6b。
397. 同上，22上/1a。
398. 同上，25/1a。
399. 傳習錄，上，第八十五條。
400. 孟子，4，離婁上，1a。
401. 尚書，28，冏命。
402. 論語，2，爲政，3。
403. 傳習錄，上，第一二九條。
404. 論語，12，顏淵，10；13，子路，11。
405. 同上，14，憲問，45。
406. 陳淳，性理字義，敬字，論誠敬之異條。
407. 論語，13，子路，6，13。
408. 同上，2，爲政，2。
409. 同上，12，顏淵，4。
410. 同上，1，學而，4。
411. 同上，16，季氏，7。
412. 同上，6，雍也，23。
413. 同上，4，里仁，2。
414. 同上，7，述而，37。
415. 同上，15，衞靈公，12。

416. 同上，7，述而，15。
417.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285—286。
418. 同上，281。
419. 論語，19，子張，12。
420. 同上，1，學而，2。
421. 同上，3，八佾，4。
422. 同上，1，學而，2。
423. 毛奇齡，大學知本圖說（西河合集本），6b。
424.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283。
425. 同上，284。
426. 論語，6，雍也，28。
427. 朱熹 大學或問，10/88。
428. 中庸，13。
429. 論語，12，顏淵，2。
430. 孟子，4，離婁上，5。
431. 同上，1，梁惠王上，7。
432. 同上，7，盡心上，45。
433. 同上，44。
434. 朱熹，大學或問，25b。
435. 孟子，5，萬章下，1。
436. 同上，6，告子上，4。
437. 同上，3，滕文公上，5。
438. 同上，3，滕文公下，1。
439. 同上，離婁上，13。
440. 同上，7，盡心上，4。
441. 同上，2，公孫丑上，2。
442. 同上。
443. 同上，4，離婁上，20。
444. 大學或問，27b—28a。恒言指孟子，4，離婁上，5，「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445. 同上，16a。
446. 論語，1，學而，4。
447. 孟子，7，盡心下，25。
44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439，444。
449. 荀子，21，解蔽，15/16b。
450. 同上，15/8a。
451. 同上，15/1b。
452. 同上，14，致士，9/12b。
453. 同上，6，非十二子，3/18b；21，解蔽，15/7b。
454. 同上，11，王霸，7/17a-b，22a。
455. 同上，13，臣道，9/6b。
456. 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二，607。

457. 參看上面第一節第四目，弟子的社會背境和活動最後一段。
458. 呂氏春秋，2，當染，10a。
459. 漢書，30，藝文志，13a。
460. 韓詩外傳，3/8b。
461. 參看註 463。
462. 同上 459 註。
463. 魏徵（580—643），隋書（百納本，1967），31，經籍志，儒家三。
464. 朱彝尊，曝書亭全集，57，孔子門人考，1a—7b。
465. 孟子，3，滕文公上，1。
466. 大戴禮記，52，曾子大孝，4/9b。
467. 同上，4/11a。
468. 孟子，2，公孫丑上，2。
469. 同上，5，萬章，上，1。
470. 論語，20，堯曰，19。
471. 禮記，21，雜記下，第二十九節。
472. 同上，4，檀弓下，第十四節。
473. 大戴禮記，58，曾子天圓，5/7a。
474. 同上，53，曾子事父母，4/12a。
475. 史記，44，魏世家，3b。
476. 漢書，30，藝文志 13b，有魏文侯六篇。隋書經籍志沒有。馬輯魏文侯書一卷二十四節。採自戰國策，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子，新序，說苑，通典。列入馬輯儒家佚書輯本五十五種。
477. 魏文侯書，1a。
478. 同上，5a。
479. 同上，6a。
480. 同上，8b。
481. 同上，序。
482. 說苑，12，奉使，5a，7b。
483. 馬繡的話。繹史，101/5a。
484. 論語，3，八佾，8。
485. 有書七篇，已佚。馬國翰輯，李克書一卷，七節，採自呂氏春秋，韓氏外傳，說苑等書，列入儒家佚書輯本五十五種。
486. 李克書，1a。也沒有卓見。
487. 同上，41a。
488. 漢書，30，藝文志，13b，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隋書，經籍志載一卷，已佚。馬國翰輯，公孫尼子一卷，十三節，列入儒家佚書輯本五十五種。
489. 公孫尼子，1b。
490. 同上。
491. 同上，2a。
492. 淮南子，7，精神訓，2a。
493. 公孫尼子，2b。
494. 同上，47a。，
495. 漢書，30，藝文志，13b，記世子二十一篇，內養生一篇，皆亡。馬國翰輯，世子一卷，兩條，列入儒家

佚書輯本五十五種。

496. 世家，2b。
497. 王充，論衡，13，本性，3/12a。
498. 漢書，30，藝文志，13a，記漆雕子十三篇。隋書不載。馬輯一卷四條，附錄七條。
499. 馬國翰輯，漆雕子一卷，1b—2a。列入儒家佚書輯本五十五種。
500. 論語，17，陽貨，2。
501. 張載，張子全書（國學基本叢書本，1935），15，呂大臨行狀，312。
502. 程顥和程頤，程氏外書，11/1b。
503. 前三書均據隋書，32，經籍志，一，禮部。三書已佚。李書恐也亡了。
504. 漢書，30，藝文志，13a。
505. 隋書，13，音樂志上，天監元年。
506. 史記，112，公孫弘傳，3b。
507. 舊唐書，37，經籍志下，1a。
508. 晁公武（1171卒）武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67），10/3a。
509. 二十五史補編，第一册（上海，開明書局，1935），漢書藝文志考證，21，全册頁1407。
510. 陳第（1541—1617），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叢書集成本）11。
511. 清儒輯子思子的數家。黃以周（1828—1899）的內篇九卷，外篇一卷，附錄一卷最好。
512. 漢書，30，藝文志，5a。
513. 王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13，古中庸跋，1a。
514. 班固，白虎通德論（四部叢刊本，1929），1/5b，6a；10/4a。
515.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104—105。
516. 孔鮒（壯年 210 B.C.），孔叢子（四部叢刊本，1929）7，居衛，卷上，45b。
517. 史記，47，孔子世家，29b。
518. 陸德明，經典釋文，14/1a 說「子思作中庸」。
519. 朱熹，中庸章句序。
520. 歐陽秀，歐陽文公集（四部備要本，1966），48，問進士策第三首，3b-4a。
521. 參看高明，禮學新探，144，引程灝，四書考異，六十二指一生之年之說。
522. 毛奇齡，四書賸言（西河合集本），6a-b。
523. 論語，3，八佾，9。
524. 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皇清經解，卷22），有宋存條，5b。
525. 葉酉，再與袁隨園書。錢基博，四書解題及其讀法（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重刊），52引。
526. 洪邁，容齋隨筆，14，楊之水條；5，三代書同文條。
527. 陳槃，大學中庸今釋，中，5；陸德明，經典釋文，14/3b。
528.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編 144。
529. 論語，3，八佾，11。
530. 陳善，捫虱新話，下集，3，讀論語條，234。
531. 崔述，洙泗考信錄，3，子思，6b-7b。
532. 俞正燮，癸巳存稿二（王先謙，1842—1917，編，皇清經解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5，卷 841，中庸大學條24a-b。
533. 俞樾，達齋叢說（皇清經解續篇，卷1350），中庸說條，6a。
534.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280—281。
535.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446—448。

536.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乙集（臺北，中央書局，1957），中庸的地位問題 122—124；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106。
537.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二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71），50。
538. 參看上註 217。
539. 朱子語類，62，頁2358。
540. 徐復觀評朱子第二十章合孔氏兩章爲一章，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107，109。
541. 宋史，438，王柏傳，8a，和根據王柏的研幾圖（金華叢書本，7b-8a），和魯齋王文憲公文集，10/4b-10a的中庸論和誠明論。
542. 參看高明，禮學新探，151；蔡愛仁，中庸研究（臺北，爲學出版社，1964），4—6；吳怡，中庸誠字的研究（臺北，華崗出版部，1963）38。
543.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107，110，145。
544. 禮記正義引。
545. 論語，6，雍也，27。
546. 同上，20，堯曰，1。
547. 同上，13，子路，21。
548. 同上，11，先進，16。
549. 同上，20。
550. 程顥和程頤，二程遺書，7/3b，15/13b。
551. 朱熹，朱子語類，62，頁2348。
552. 同上，63，頁2415。
553. 同上，62，頁2349。
554. 同上，62，頁2348。
555. 同上，62，頁2349。
556. 註第二章。
557. 二程遺書，7/3b。朱子語類 62/2b 以爲明道語。
558. 二程遺書，15/13b。
559. 朱熹，中庸章句，2。
560. 朱子語類，62，頁2350。
561. 同上。
562. 同上，62，頁2351。
563. 同上，62，頁2353。
564. 中庸章句，2。
565. 朱子語類，62，頁2349。
566. 二程遺書，18/14b-16a。
567. 參看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2，頁123—147；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69），3，頁71—228。
568. 詩經，小雅，蕩之什，6，烝民。
569. 論語，5，公冶長，12；17，陽貨，2。
570. 同上，16，季氏，8。
571. 同上，4，里仁，13。
572. 同上，15，衞靈公，23。
573. 朱子語類，64/14b。

574. 大學章句，23。
575. 大學或問，28a。
576. 孟子，4，離婁上，12。
577. 同上，7，盡心上，4。
578. 同上，7，盡心下，25。
579. 同上，7，盡心下，24。
580. 同上，7，盡心上，1。
581. 同上。
582. 同上，7，盡心上，2。
583. 同上，7，盡心上，14。
584. 同上，7，盡心上，1。
585. 同上，2，公孫丑上，6。
586. 荀子，6，非十二子，3/14b。
587. 禮記，32，表記，第十一節。
858. 章炳麟，太炎文錄初編（章氏叢書本，1919），子思孟軻五行說，1/8a。
589. 譚戒甫，思孟五行攷，列入古史辨，第五册，709—710。
590. 呂氏春秋，14，孝行，1b-2a。
591. 尚書，3，洪範，第三節。
592.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593. 國語，4，晉語上（四部備要本，1927），7b。
594. 同上，16，鄭語，4a。
595. 論語，6，雍也，21。
596. 同上，17，陽貨，21。
597. 關于陰陽五行，可參看古史辨，第五册，梁啓超，顧頡剛，錢穆，徐文珊，譚戒甫等人文章；李漢三，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臺北，鐘鼎文化出版公司，1967）；孫廣文，先秦兩漢陰陽五行說的政治思想（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小林信明，中國古代陰陽五行思想の研究（東京，講談社，1951）。
598. 史記，74，孟子荀卿列傳，2b。
599. 鹽鐵論，11，論儒，13。
600. 史記，47，孔子世家，16a。
601. 漢書，30，藝文志，14b。
602. 韓詩外傳，4/11b。
603. 王應麟　困學紀聞（國學基本叢書本，1935），846—847。
604. 盧文弨　荀子集解，6，非十二子。
605. 顧頡剛　五德始終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列入古史辨，第五册，409—410。
606.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55。
607. 同上註 602。
608. 荀子，20，樂論，14/7a。
609. 同上，9，王制，5/16b。
610. 同上，17，天論，11/17a。
611. 同上，23，性惡，17/2a。
612. 禮記，9，禮運，第廿四至廿六節。
613. 同上，34，鄉飲酒義，第十二節。

614. 漢書，30，藝文志，13a。
615. 孔叢子，6，雜訓，上册，34a；同上，34b；同上，35a；7，居衛，43a；同上，44a；10，抗志，53a；同上，60a。
616. 墨子，48，公孟，12/14a。
617. 淮南子，21，要略，6b。
618. 呂氏春秋，25，有度，4b。
619. 韓非子，50，顯學，19/7b。
620. 同上，49，五蠹，19/2b。
621. 淮南子，9，主術訓，17a。
622. 同上，2，俶眞訓，11b-12a。
623. 史記，130，自序，4b。
624. 大戴禮記，68，千乘，9/2a。
625. 陳澧，東塾讀書記，9，禮記，2—3。
626. 韓愈，韓昌黎全集，11/16b。
627. 王安石 臨川集（四部叢刊本，1927），4/6。
628. 二程遺書，18/37a。
629. 呂氏春秋，17，不二，15b。
630. 尸子，卷下，頁9a。
631. 韓非子，50，顯學，19/7b-8a。
632. 同上，617註。
633. 墨子，48，公孟，12/13a。
634. 同上，39，非儒，9/17a-b。
635. 同上，9/21a-b。
636. 同上，墨子佚文（四十八子本），15/1a-b。
637. 呂氏春秋，12，不侵，7b。
638. 同上，15，順說，12b。重見淮南子，12，道應訓，4b；列子，黃帝，4b。
639. 呂氏春秋，2，當染，10a。
640. 同上，25，有度，4b。
641. 同上，12，當染，10a。
642. 莊子，11，在宥，5/49a。
643. 韓非子，50，顯學，19/7b。
644. 莊子，11，在宥，4/32a。
645. 同上，2，齊物，1/27a。
646. 淮南子，2，俶眞訓，10a。
647. 同上，13，氾論訓，7b。
648. 淮南子，21，要略，6b。關于儒墨並盛，和儒墨交攻，參考康有爲，孔子改制考，371—388，412—421。
649. 荀子，6，非十二子，3/16a。
650. 同上，3/12a。
651. 同上，3/21a-b。
652. 同上，8，儒效，4/14b。
653. 同上，4/15b。
654. 同上，4/16a。

655. 同上，6，非十二子，3/15a-b。
656. 同上，3/16a。
657. 論語，12，顏淵，2。
658. 同上，6，雍也，1。
659. 禮記，3，檀弓上，第五十二至五十四，六十八，七十一，七十六，八十一，八十七節；4，檀弓下，第二十二，二十七節。
660. 郝懿行，荀子補註，上（郝氏遺書本，光緒辛巳，1881），6，非十二子，16b。王先謙，荀子集解（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6，非十二子，3/16a—17a，22b，同意郝氏，並且引他。
661. 荀子，6，非十二子，註，3/21a。
662. 韓非子，50，顯學，19/7b。
663. 同上，19/8a。
664. 郭沫若，十批判書（上海，羣益出版社，1950），130。
665.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124。
666. 皮錫瑞，經學歷史（四部叢刊本，1959），8b，八位姓顏的弟子是：顏回(1)，顏無繇(20)，顏幸(31)，顏高(40)，顏祖(52)，顏之僕(58)，顏噲(66)，和顏何(72)。
667. 漆雕開(23)，漆雕哆(29)，漆雕徒父(41)。
668. 論語，5，公冶長，5。
669. 墨子，38，非儒下，9/22b。
670. 孟子，2，公孫丑上，2。
671. 如洪亮吉，梁啓超等。參看蔡仁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157。
672. 同上註 670。
673. 王先謙，韓非子集解（光緒丙申，1896本），50，顯學，19/13a。
674. 漢書，20，古今人表，38b。
675. 禮記，3，檀弓上，第七十五節。
676. 詩經，國風，鄘風，6，定之方中。
677. 孟子，3，滕文公上，4。
678. 梁啓超，諸子考釋（臺北，中華書局，1966），39。
679. 漢書，20，古今人表，33b。
680. 孟子，2，公孫丑上，16。
681. 同上註 678。
682. 韓非子，50，顯學，19/8b-10b。
683. 論語，17，陽貨9；13，子路，4。

引用書目舉要

1. 錢　穆，先秦諸子繫年（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
2. 許同莘，孔子年譜（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1955）。
3. 崔　述，洙泗考信餘錄（崔東壁遺書本，1924）。
4. 錢　穆，論語要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5. 呂氏春秋（四部備要本，1927）。

6. 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本，1930）。
7. 韓詩外傳（四部叢刊本，1929）。
8. 孟子（任何版本都適用。下同）。
9. 論語。
10. 漢書（百衲本，1967）。
11. 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臺北，復興書局，皇清經解本，1961）。
12. 史記（百衲本，1967）。
13. 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臺北，復興書局，皇清經解本，1961）。
14. 金 鶚，求古錄（續台州叢書本，同治丁卯，1867）。
15. 梁玉繩，史記志疑（叢書集成本，1939）。
16. 張文虎，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金陵書局本，同治壬申，1872）
17. 王念孫，讀書雜誌。
18. 蔡仁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臺北，商務印書館，1969）。
19. 馬 驌，繹史（臺北，廣文書局，1969）。
20. 朱彝尊 曝書亭全集（四部備要本，1966）。
21. 焦 循 孟子正義。
22. 毛奇齡 四書賸言補（西河合集本，乾隆庚寅，1770）。
23. 韓非子（四部叢刊本，1929）。
24. 淮南子（四部備要本，1927）。
25. 大戴禮記（四部叢刊本，1929）。
26. 後漢書（百衲本，1967）。
27. 水經注（四部備要本，1966）。
28. 魏書（百衲本，1967）。
29. 顏之推，顏氏家訓（四部備要本，1966）。
30. 莊子（四部叢刊本，南華眞經，1929）。
31. 劉師培，古書疑義舉例補（長沙，鼎文書社，1924）。
32. 謝 湘，墨子學說研究（香港，上海印書館，1967）。

33. 康有爲，孔子改制考（上海，中華書局，1968）。
34. 墨子（四部叢刋本，1929）。
35. 桓 寬，鹽鐵論（上海，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1954）。
36. 中庸（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本）。
37. 荀子（四部叢刋本，1929）。
38. 朱彝尊，經義考（四部備要本，1966）。
39. 禮記。
40. 說苑（四部叢刋本，1929）。
41.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42. 孝經。
43. 王 充，論衡（四部備要本，1927）。
44. 尸子（四部備要本，1933）。
45. 馬國翰輯，儒家佚書輯本五十五種（臺北，世界書局，1958）。
46. 陶 澍，群輔錄（藝苑捃華本，光緒壬辰，1868）。
47. 劉寶楠，論語正義。
48.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四部叢刋本，1919）。
49. 韓 愈，論語筆解（叢書集成本，1939）。
50. 錢 穆，論語新解（香港，新亞研究所，1963）。
51. 李 翺，論語筆解（叢書集成本，1939）。
52. 王 弼，論語釋疑。
53.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國立華北編譯館，1943）。
54. 朱 熹，論語集註（朱熹，四書章句集註本）。
55. 新唐書（百衲本，1967）。
56. 徐 幹，中論（四部叢刋本，1929）。
57. 程顥、程頤，二程外書（四部備要，二程全書本，1933）。
58. 尤 侗，艮齋雜說（四庫全書珍本三集本，1972）。
59.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1968，1971）。

60. 劉汝霖，周秦諸子考（北平，文化學社，1929）。
61. 陸象山（九淵），象山全集（四部備要本，1934）。
62. 郭紹虞　論孔門學風只有務外主內兩派書，列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二冊，（北平，樸社，1930），253-254。
63. 鄧公玄　孔子以後儒家蛻變之因果，列入黃建中編，中國哲學史論集，第一冊（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1958），53-89。
64. 劉百閔，孔門五論（臺北，世界書局，1968）。
65.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0）。
66. 武內義雄，中國哲學思想史，汪馥泉譯（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67. 平原北堂，支那思想史（京都，人生道場，1942）。
68. 吉田賢抗，中國思想史（東京，明治書院，1949）。
69. 狩野直喜，中國哲學史（東京，岩波書店，1953）。
70.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1. 梁啓超，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臺北，中華書局，1963）。
72. 大學（朱熹，四書章句集註本）。
73. 韓　愈，韓昌黎全集（四部備要本，1920）。
74. 李　翺，李文公集（四部叢刊本，1929）。
75. 程顥和程頤，二程遺書（四部備要，二程全書本，1933）。
76. 朱　熹，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70）。
77. 朱　熹，大學或問（四書大全本，康熙壬午，1702）。
78. 朱　熹，大學章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本）。
79. 王陽明（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四部叢刊本，1929）。
80. 全漢文（臺北，廣文書局，1969）。
81. 王應麟　玉海（四部備要本，1966）。
82. 宋史（百衲本，1967）。
83. 程顥和程頤，程氏經說（四部備要，二程全書本，1933）。
84. 孔穎達，禮記正義。

85. 高　明，禮學新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63）。
86. 朱　熹，朱子文集（四部備要本，朱子大全，1930）。
87. 張　華，博物志（秘書廿八種本，嘉慶辛未，1811）。
88. 翟　灝，四書考異（臺北，復興書局，皇清經解本，1961）。
89. 王　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70）。
90. 鄭　曉，大學源流。
91. 陳耀文，經典稽疑（四庫全書珍本二集本）。
92. 毛奇齡　大學證文（西河合集本，乾隆庚寅，1770）。
93. 胡　渭，大學翼眞（四庫全書珍本三集本）。
94. 錢　穆，中國思想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
9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二（香港，新亞研究所，1973）。
96. 陳　榮，大學中庸今釋（臺北，正中書局，1944）。
97　方東樹，漢學商兌（光緒八年，1882）。
98. 朱鶴齡，愚庵小集（北京，燕京大學圖書館，1940）。
99. 陳　澧，東塾讀書記。
100. 康有爲，康南海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101.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中，東海大學，1963）。
102. 戴君仁，梅園論學集（臺北，開明書店，1970）。
10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上冊（香港，人生出版社，1966）。
104. 程元敏，大學改本詳述，孔孟學報，23（4/1972）。
105. 唐君毅，大學章句辨證及格物致知思想之發展，清華學報，4/2（2/1964），1-49。
106. 林政華　大學中庸之作者與章次考辨，東方雜誌，9/4（10/1975），41-48。
107. 胡　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108. 陳　淳，性理字義。
109. 毛奇齡，大學知本圖說（西河合集本，乾隆庚寅，1770）。
110.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111. 隋書（百衲本，1967）。

112. 張　載，張子全書（國學基本叢書本，1935）。
113. 晁公武，武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67）。
114. 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1935）。
115. 陳　第，世善堂藏書目錄（叢書集成本）。
116. 班　固，白虎通（四部叢刋本，1929）。
117. 孔叢子（四部叢刋本，1929）。
118. 陸德明，經典釋文（叢書集成初編本）。
119. 朱　熹，中庸章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本）。
120. 歐陽修，歐陽文公集（四部備要本，1966）。
121. 毛奇齡，四書賸言（西河合集本，乾隆庚寅，1770）。
122. 葉　酉，再與袁梅書。
123. 洪　邁，容齋隨筆。
124. 陳　善，捫虱新話。
125. 俞正燮，癸巳存稿（臺北，藝文印書館，皇清經解續編本，1965）。
126. 俞　樾，達齋叢說（臺北，藝文印書館，皇清經解續編本，1965）。
127.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中央書局，1957）。
128. 玉　柏，研幾圖（金華叢書本）。
129. 蔡愛仁，中庸研究（臺北，爲學出版社，1964）。
130. 吳　怡，中庸誠字的研究（臺北，華崗出版部，1963）。
131. 錢　穆，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
13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69）。
133. 章炳麟，太炎文錄初編（章氏叢書本，1919）。
134. 譚戒甫，思孟五行考，列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五冊，704–727。
135. 國語（四部備要本，1927）。
136. 李漢三，先秦兩漢陰陽五行學說（臺北，鐘鼎文化出版公司，1967）。
137. 孫廣文，先秦兩漢陰陽五行的政治思想，（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

138. 小林信明，中國上代陰陽五行思想の研究（東京，講談社，1951）。
139. 王應麟，困學紀聞（國學基本叢書本）。
140. 盧文弨，荀子集解。
141. 顧頡剛，五德始終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列入古史辨，第五冊，404-617。
142. 王安石，臨川集（四部叢刊本，1927）。
143. 郝懿行，荀子補注（郝氏遺書本，光緒辛巳，1881）。
144. 王先謙，荀子集解（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145. 郭沫若，十批判書（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
146. 皮錫瑞，經學歷史（四部叢刊本，1959）。
147. 王先謙，韓非子集解（光緒丙申，1896本）。
148. 梁啓超，諸子考釋（臺北，中華書局，1966）。